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6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六期 ★

目 录

共产党员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 杜 敬 (1)

从全局出发 …………… 陈展超 (8)

从信贷的偿还原则谈到银行的监督作用…… 李佐文 (11)

历史剧三题 …………… 戴不凡 (15)

古典文学理论中的风格问题 …………… 刘绶松 (21)

所谓“自由的臂膀”的真相 …………… 陈 原 (27)

在“全民福利”的幌子下 …………… 张振亚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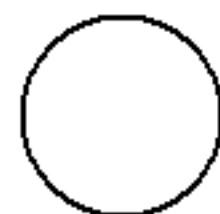
关于臭椿—蓖麻—蓖麻蚕—寄生蜂的

连串发展和综合利用问题的芻议 …朱 洗 (34)

漫画：美国之“鸚”(江 帆) 飞向更新的边疆(华君武)

木刻：韶山四月(刘彦明) 电灌站(莫 溯)

☆ 三月十六日出版 ☆



共产党员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

杜 敬

群众的好的领导者，应该是群众的真正的代表。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正确地领导群众前进。

我们党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忠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刘少奇同志说：“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②几十年来，我们党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时候，在生产建设当中，在任何情况下，处理任何问题，规定每一项政策，我们党都是以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原则的，因而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热诚拥护，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广大人民群众，根据几十年来的亲身体会，深信我们党是他们最好的代表，自愿地把自己的事业委托给党，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党。我们党所以能够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领导者，就是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真正代表，是人民群众自己选定的代表。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十分珍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委托，十分珍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极高的威信。在我们的一切言论、行动中，应该具有对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自己是受了党的委托、受了人民群众的委托做工作的，如果有丝毫的懈怠疏忽，就可能使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他又说：“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③。这就是党和人民群众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提出的要求。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经常用这个标准来检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7页。

② 《论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版，第46页。

③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128页。



查自己，勉励自己，努力做一个人民群众的好代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以及国家的统一计划，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志，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因此，认真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各项统一政策，认真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并且及时地、正确地反映执行政策、计划中的情况和问题，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这是对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一方面做得好，才能成为群众的好代表。

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就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因此，党员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也是一致的。刘少奇同志说：“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他又说：“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①党中央的统一的政策，国家的统一的计划，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情况下具体地贯彻执行，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项工作开始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群众由于对党的有关政策还没有很好的理解，因而还没有行动的决心。如果我们不进行艰苦的工作，去提高群众的觉悟，就由此得出结论说，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是很难统一的，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人民群众需要忠实的代表，也需要

很好的领导。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要忠实地代表群众，同时也要很好地领导和教育群众，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这样，群众就会认识什么是他们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就会懂得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就会接受党的政策而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在革命时期是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在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时候，所以要对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这是因为，我们不仅要注意群众的需要，还要注意群众的自愿。如果没有群众的自愿，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成功了也不会巩固，这归根到底还是对党没有负责，也就是对群众没有负责。毛泽东同志说：“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②他又说：“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③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强调指出，必须“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自愿，才能去实行改革。在实行某项改

① 《论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版，第46页。

②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1页。

③ 同上书，第1010页。



革的初期，先进分子往往只占少数，中間和落后状态的群众則占多数。我們不能把少数先进分子的觉悟水平看作就是广大群众的觉悟水平，不能把少数人有了自願看作就是多数人有了自願，否則就会脱离多数，脱离群众。毛澤东同志說：“共产党員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數，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顧，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須注意組織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間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他說：一个好的共产党員，必須善于照顾多数。^① 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之所以需要进行艰苦、耐心的工作，就在于必須把工作做到多数人的身上去，做到中間和落后状态的群众身上去，而且要做透、做好。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員。

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情况下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还需要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使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同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結合，为当地的群众所接受。这是要做許多复杂、細致的工作的。如果采取一般化、簡單化的方法去做工作，就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同当地情况相結合，机械地执行政策和計劃，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結果，本来是符合群众利益的事情，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另一种是，工作沒有做到，就认为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不符合当地情况，因而不认真执行或者随便修改，另搞一套违背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的东西，自认为是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違背了群众的利益。这两种做法的結果是一样的，都

是没有真正代表群众。因此，有了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我們在执行中并不是就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了。例如，在领导农业生产当中，必須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才能使生产得到发展，使国家和农民的收入得到增加。而对于农业生产中的耕作制度和技術措施等等，則必須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尊重当地群众的經驗，做到因时因地制宜，否則仍然达不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目的。再如，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当中，必須认真执行党的按劳分配的政策。而在广大社員当中，有着家庭人口多和人口少的不同，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少的不同，有劳动力和沒有劳动力的不同，以及劳动力的強弱不同和技術的高低不同等等复杂的情况。必須經過細致的調查研究，甚至一戶一戶地、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从安排农活、支配劳动力、規定評工記分办法等等方面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具体措施，做到在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当中，周密地照顾到不同社員的利益，使大家都能增加收入，調动起广大社員的生产积极性。

在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当中，注意随时听取群众的意見，发现新的情况和新的問題，及时地、确切地向上級反映，使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員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我們缺乏这种自觉性和責任感，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4頁。



就会不利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利于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说：“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①足见党员的责任的重大。如果不去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不去了解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或者虽然听到了、看到了却置若罔闻，不及时反映，或者因为计较个人的得失而不愿反映或不如实地反映，这些都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也是对群众没有负起责任。

听取群众的意见，必须听到群众心里的话，懂得群众的心，才能真正了解群众，也才能真正代表群众。因此，我们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当作群众的意见，不能把走马观花看到的一些现象，当作事物的本质，而应该深入群众之中，进行切切实实的调查。

到了群众当中，能不能真正听到群众心里的话，还取决于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干部把自己摆在群众中的什么地位，而不是任何一个人临时到群众中去简单地问上几句就能够听到的。群众心里的话，只会向知心人讲，向自己人讲，向和他们站在一起、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人讲。我们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地站在群众之中，对群众采取谦虚恭敬的态度，热诚地关心群众的生活，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群众亲切地感到干部是他们自己人，是知心朋友，才会讲真心话。如果以“钦差大臣”的架子去访问群众，群众就会敬而远之。

如果只是听到群众把干部的意见复述了一遍，就认为是听了群众的意见，那只是无济于事走过场而已。如果听到不合自己口味的話就不高兴，不耐烦地听下去，甚至斥责群众，结果就会什么话也听不到。在群众中摆官架子，以领导者自居，自认为比群众高一等，那不是群众的代表和人民勤务员的老实态度，而是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一种低级趣味，必然受到群众的鄙视，使自己脱离群众。

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如何，这是能不能成为群众的真正代表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仅仅在嘴上大讲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②我们要做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要成为群众的真正代表，就必须正确处理自己同群众的关系。

群众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判断其正确与否，不应该简单地以我们自己的意见做标准，匆匆忙忙地做结论，而应该领导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由他们自己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坚定地相信群众中的多数，相信他们经过教育启发以后，经过认真的讨论以后，是能够分清是非的，是能够得

^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42—1443页。

^②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55页。



出正确的結論的。对群众进行教育，也应该首先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的意見，然后采取耐心說服的方法，民主地、平等地同群众进行討論的方法去教育群众。有各种不同的意見，經過反复討論，才能真正提高群众觉悟，糾正錯誤認識。先有不一致，再达到一致，才是真正的一致，这种一致才更加巩固。能够耐心地听取群众中的各种意見，特别是听和自己的認識不同的意見，是每一个干部所应该具有的民主作風。听了群众中的正确意見，对自己有帮助；听了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意見，对自己也有帮助。从对于正确和錯誤的分析比較中，会更加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認識。

听群众的話，要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見，还要总结群众的实践經驗，虛心地向群众学习。我們的事業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依靠群众創造經驗。领导的經驗，要依靠不断总结群众的实践經驗才能逐步丰富。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綫和土地改革政策，就是經過了二十几年的实践，才逐步完备起来的。革命是如此，建設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設当中的許多政策、措施，同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补充、修正。我們首先树立了这样的观点，才会重視群众的实践經驗。切不可被自己脑子里已經形成的定型了的观念所束縛，根本不去怀疑，不願打破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观念。切不可认为自己的想法是不可改变的，是不能再发展的。列宁在談到怎样建設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經指出：“在这个偉大的事业中，我們从来不能要求，而且無論哪个談到

未来社会远景的有卓見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會想到，說我們能够根据某种預定的指示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組織形式。”“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經過一条偉大的路程，生产資料私有制已被历史判处死刑，……可是，改造的形式和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們都不知道。只有集体的經驗，只有千百万人的經驗，才能在这方面給我們以决定性的指示”^①。我們领导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必須像过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那样，随时总结群众的經驗，取得人民群众的“决定性的指示”。领导群众，要首先接受群众的指示，首先向群众学习，这是不容易的。必須自觉地承认群众的集体智慧、集体經驗比干部的智慧 and 經驗丰富得多，并且能够放下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才能做到这一点。自认为自己比群众聪明的人，不会有真正的聪明。这样的人去领导群众，是不会有什麼真本領的，是不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什麼問題的。

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又能虛心地向群众学习，我們就会做出許多符合群众利益的事情。过去我們許多同志这样做了，不愧为群众的代表。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过去有許多事情做对了，今后就一定不会做錯，过去代表了群众的利益，今后也一定能够事事代表群众的利益，因而就驕傲自滿起来，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了。过去的事情

^① 《在国民經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
第384頁。



做对了，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做对了；基本上做对了，应该想一想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一个问题解决了，应该想一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发现，没有解决。情况变化了，新的问题出现了，新的任务到来了，就应该从头学起，从头做起，重新研究情况，寻找解决新问题、完成新方法。已有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但是，任何宝贵的经验，都不会给我们提供出一劳永逸的办法，使我们不再费脑子、不再下苦功夫就能够把事情做好。对群众严肃负责，必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态度。

我们的广大党员，都有代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愿望，都想为群众办成好事。过去，我们这些同志已经为群众办成了很多好事，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实现了这个良好的愿望。但是，我们所以能够真正代表群众，能够为群众办成好事，并不是只由于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而是付出了许多艰苦努力的结果。有的时候，有些同志由于受到认识水平的限制，或者由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对头，或者由于工作没有做到，因而没有真正了解到群众的要求，没有真正搞清做什么和怎样做才符合群众的利益，结果，就可能做出自以为是符合群众利益的，实际上却是违背群众利益的事情。好人好心，也可能办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事与愿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

的标准。”^①我们不能以为只要有一颗好心，有好的动机，就一定能够为群众办成好事，不能以为自己想的就一定是代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而必须根据工作的效果去检验是否真正符合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共产党员，群众的代表和领导者，这些称号是光荣的。但是，这些称号并不能自然地给我们带来什么本领，使我们不费力气地就可以想出为群众造福的妙计。恰恰相反，这些光荣的称号，给我们提出了很高的、很严格的要求。要使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都无愧于自己的光荣称号，都符合于群众的利益，就必须付出极为艰苦的努力。

作为群众的代表和领导者，责任是十分重大的。群众的幸福生活，固然要由群众自己动手去创造，但是，领导者的工作做得好一些或者差一些，对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也有重大的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出一个主意，就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一个公社，就关系到成万人；在一个县，就关系到几十万人。主意出对了，事情做好了，成万人或几十万人受益；主意出错了，事情没做好，成万人或几十万人的利益就可能受到或多或少的损失。关系如此重大，领导者的责任如此重大，就必须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心里，为了群众利益而不辞任何劳碌，不避任何艰辛，而决不能随随便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0页。



样做就怎样做。作为群众的代表，对多少万人负责，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采取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兢兢业业，甚至废寝忘食，而决不能马马虎虎，掉以轻心。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个别的缺点或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敢于正视和修正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能够自觉地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风格和勇气，是对人民群众认真负责的表现。只有如此，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称得上是群众的真正代表。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关心的，是千百万群众得到了利益没有，而不是自己得到了什么没有。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担心的，是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失没有，而不是自己损失了什么没有。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个人的利害得失，不仅不应该计较，

而且应该忘掉。所谓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所谓忘我的精神，就表现在这里。不能忘我，就不能对群众全心全意，就不能真正代表群众。共产党员和群众有所不同，比群众觉悟更高，也是表现在能够为了群众的利益而不计较个人的一切，甚至忘掉个人的一切。如果为了个人的得失而不顾群众的利益，知道错了也不改正，或者发现了上级的缺点错误也不反映，甚至假借为群众谋利益的名义去图谋私利和个人荣誉，那就丧失了群众代表的起码条件。

我们党是人民群众最好的代表。一切为了党的利益，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我们要使自己的一切言论、行动，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们代表人民群众一定要代表得好。



韶山四月

刘续明



从全局出发

· 陈 展 超 ·

我們在任何崗位上做工作，总会遇到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的問題。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是从全面情况或全局利益出发的全局观点，一个是从局部的需要或利益出发而不顾全局的片面的狹隘的观点。我們应当采取前一种观点，反对后一种观点。毛澤东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①他又說：“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个黨員，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許可違反这个原則。”^②这个原則是我們在想問題、作計劃、办事情时應該遵循的。

照顾全局的观点，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无产階級的观点。革命的无产階級是干解放全人类的大事业的，他們沒有任何局部保守性，不图任何狹隘利益，反对一

切只顾自己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傾向。他們依靠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看到事情的全体，善于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决定自己的計劃和行动。也正因为这样，无产階級能够进行胜利的斗争。

任何事物总是由各个不同的方面和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构成的。这些方面和发展阶段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相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全局。我們要認識一事物的全局，就是要認識构成这一事物全局的各方面、各局部的相互联系，認識整个事物的发展規律。只有通观事物的全局，才能够认清各局部在全局发展中的序列、地位和作用，认清在一定具体情况下，何者是主要的、对全局起决定性的作用的，何者是次要的、起輔助作用的；何者应急，何者应緩；何者在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3—514頁。

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3頁。



先，何者在后。任何一个局部，如果把它孤立起来，是无法理解的。某一局部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起什么作用，居于什么地位，只有从这一局部和其他局部的关系，也就是从全局出发，才能看清楚。

处于局部地位、指挥局部工作的人，当然必须充分了解自己这个局部的具体情况，必须紧紧抓住自己这个局部的工作，而不能丢开这个局部，空谈全局。但是他们也必须懂得全局性的东西，善于照顾全局。如果只知道局部，而不懂得全局，是不能做好工作的。毛泽东同志说：“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①

但是人们如果脱离了任何局部，要认识全局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说：“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②这就是说，一方面，只有局部经验，而不用心思去想，是不能懂得全局性的东西的，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局部经验，而只是凭空地想，也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认识全局，需要做个别典型的调查研究；为了指导全局的工作，需要进行个别的典型试验，以取得具体经验。

当然不能根据上面这些得出结论，说全

局的东西和局部的东西是完全等同的，局部并不存在着自己的特殊情况；或者说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一致，没有矛盾。如果这样了解，那也是不正确的。

全局性的方针、政策、计划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是在分析综合各局部^{（局部）}的情况、总结各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全局包括了局部。但是，任何全局性的方针、政策、计划，只不过是大致地包括了各个局部的情况和经验；任何局部的情况和经验，都不能完全地列入全局性的方针、政策、计划之中。在全局的范围内，各个局部的具体情况总是千差万别，各局部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局部的特殊性。调查了个别典型，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以后，还必须善于发现其中本质的东西，剔除其中特殊性的东西，这样才能上升到更高级的认识，所以说，必须用心去想一想。另一方面，把全局性的东西（统一的方针、政策、计划等）贯彻执行到某一局部中去，也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局部的具体情况，必须因地制宜。

局部隶属于全局，统一于全局，但局部和全局又有矛盾。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往往表现为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8页。

② 同上书，第170页。



处理这种矛盾的原则，就是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使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集中统一和发挥局部积极性相结合。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局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来说，不但在全国统一计划和局部需要相一致的时候，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努力完成国家计划，而且在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发生某种矛盾的时候，也要有局部服从全局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局部看来可办而在全局看来不可办的事情，就不办；在局部看来不可办而在全局看来可办又需要办的事情，就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地去办，而且办好。在后一种情况下，某一局部的需要暂时会得不到满足，看来好像是吃了一点点“眼前亏”。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局部吃了这点“眼前亏”，全局的事情才好办。而随着全局的发展，这个局部的正当需要也会逐步得到满足，而且是更好的满足。所以，从长远一点看，从最终结果看，这个局部是不会“吃亏”的。反之，如果当全局需要和局部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只考虑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忘掉全局的长远的利益，以削弱全局为代价来满足局部，就会损害全局，结果也必然损害局部。

对于各个局部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分清两种不同的积极性。一种积极性是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在全局统率之下，实

事求是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自己的一切有利条件，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积极性。另一种积极性则是只看到局部的需要，只顾眼前利益，在没有首先保证完成国家统一计划的情况下，去兴办国家计划以外的事情，分散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使有限的资金和物资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这既妨碍国家计划的完成，又使局部的事情办不好，是一种盲目的积极性。前一种积极性，对全局有利，对局部也有利，是我们所需要的；后一种积极性，对全局不利，对局部也不利，是我们所反对的。

从全局出发，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是不是限制了局部的自由和权力呢？局部是全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局部只能具有一定的权力和自由。就这个意义来说，局部的权力和自由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认清了全局，并且认清了局部在全局中所占的地位，就能够正确地行使局部的权力，这样，就会有真正的行动自由。恩格斯说：“意志的自由，不是别的，只是由于认识事物而能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①处于局部地位的人，越是能够了解全局，越是善于照顾全局，从全局出发，就越有自由，越有把握做好局部工作，就越能为全局的胜利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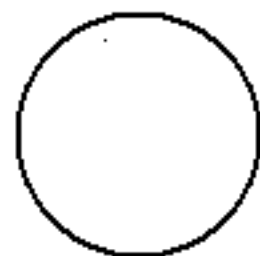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7页。



从信貨的偿还原則

談到銀行的監督作用

李 佐 文



社会主义的国家銀行，对整个国民經济，可以起“晴雨表”的作用，它是国家通过货币形式对国民經济各部門、各企业进行監督的重要工具。按照列宁的說法，它是“全国性的簿記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統計机关”，甚至是一个“絕妙的机关”^①。銀行的監督作用，是通过信貨存放、結算和現金管理等业务活动来实现的。銀行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把整个經济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使經济领导机关了解这些情况。因此，它又是經济领导机关的有力助手。这里，只談談銀行怎样通过信貨存放和及时反映經济活动情况来发挥監督作用的一些問題。

銀行信貨的最根本的一条原則，就是偿还原則，就是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还。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还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并不很简单。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信用活动是自发的、盲目的。企业主借了銀行的錢，投到生产中去，如果产品不能及时卖掉，就不能按时如数还賬。破产还債、跳楼自杀之类的事，是屢見不鮮的。資本主义信用的破坏，最明显地表现在資本主义的周期性經济危机中。在这个时候，生产过剩

和信用危机往往交織在一起，其結果是助长了資本的集中，加深了劳动人民的苦难。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資料是公有的，生产和流通是按計劃进行的。信用机构由剝削人民的工具，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这样，信用活动按計劃进行，就有了客观基础。有了計劃的指导，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还的原則，也就能够得到实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完全可能避免信用关系的破坏，当然更不会有什麼信用危机了。这是社会主义經济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但是，这并不是說，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一笔借款，都能够按期如数归还。社会主义生产的計劃性和信用的計劃性，是要通过人們的努力来实现的。当生产和流通的某些环节之间发生不平衡的时候，当主观安排同客观实际不完全符合的时候，有的企业借了錢，就不能按期如数归还。經過采取措施加以調整之后，才能达到新的平衡和主客观的一致，做到按期如数归还。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企业做到借了銀行的錢按期如数归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① 《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7—88頁。



拿生产企业來說，除了生产計劃积极可靠、企业保有必要的經常需要的自有資金以外，一般說來还需要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企业借了銀行的錢，能够买到所需要的原料和材料，而且品种、規格、数量，都合乎要求；第二，把这些原料、材料投入生产，能够按期完成生产計劃；第三，能够按期把产品銷售出去，完成銷售計劃；第四，能够按国家的要求，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完成利潤計劃。一句話，信用計劃的實現，必須以生产和流通計劃的實現为前提。只有生产和流通的計劃實現了，錢出去，貨(原料)回来，貨(产品)出去，錢回来，企业得到了預期的銷貨進款，才能繳納稅款和計劃規定的利潤，并且有錢按期如数归还銀行的貸款。生产和銷售計劃沒有完成，固然无錢还賬；就是完成了生产和銷售計劃，如果成本过高，利潤計劃沒有完成，繳納了利潤，就沒有錢还賬，还了賬，就沒有錢繳納利潤。如果企业亏了本，不仅无錢还賬，还要向銀行申請增加貸款，才能維持生产。此外，如果有的企业借了銀行的錢，沒有用来购买原料、材料，投入生产；而是用于基本建設和其他財政性支出，把錢花掉了，这自然更无法按期如数归还銀行的貸款了。

由此可見，借了銀行的錢能不能按期如数归还，对于企业經營管理和經濟核算，是一个很好的檢驗尺度。从生产到流通，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了故障，都可以在这里反映出来。这个檢驗方法，簡便易行，一目了然，可以为发现許多复杂的經濟問題提供線索。銀行坚持按計劃貸放，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

还的原則，就可以發揮很大的監督作用。

社会主义的国家銀行，是为发展国民經濟服务的。国营工商企业，除了国家撥給的固定資產和定額流動資金以外，季节性、临时性需要的資金，由国家銀行負責貸款，企业借錢比較方便。这对于生产的发展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也有些同志产生了一种錯觉，认为自己的企业經營管理差一点不要紧，資金周轉不灵了，銀行可以貸款；到期还不了賬，拖几天沒有多大关系，橫堅銀行可以通融，总不能眼看着企业停止生产。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想法。

借了銀行的錢不按期如数归还，这在經濟上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国家計劃以外，多占用了資金和物資，使一部分資金和物資不能正常周轉，因而减少了增加生产的可能性；它意味着占用了一部分可以投入建設的資金和物資，影响了建設的速度；它意味着减少了一部分可以投入市場的商品，影响国家回籠貨幣，增加了市場貨幣流通量。不管你主观上是否意識到这一点，客观上必然产生这样的結果。

通常說，社会主义国家銀行发放貸款有三大原則，一是按計劃貸放，二是要有物資保证，三是要按期如数归还。偿还性，这是信用活动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原則。“欠債还錢”这个規矩，在資本主义社会，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是为維持資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是为維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的。目的和作用根本不同，規矩却是一个。



要做到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还，首先要要求主管部門和企业安排好生产、供应和銷售工作，踏踏实实地改善經營管理，加强經濟核算，实现国家計劃規定的产品品种、数量、质量、成本、利潤等項指标。同时，銀行应当从信貸方面，加强对企业的監督。銀行要配合有關部門，深入企业，发现生产和流通中的問題，及时提請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門注意解决。銀行要利用自己联系面广的有利条件，积极帮助企业解决某些可以解决的問題，改善經營管理。大跃进以来，在这方面創造的一些良好經驗，要繼續坚持。銀行对那些違反信貸紀律的企业，要按照国家的規定，給予应有的信貸制裁，必要时停止发放貸款。这样，就迫使企业去寻找不能按期如数归还貸款的原因，根据这些原因，采取措施，从而推动企业改善經營管理，处理积压物資。

有人說，資本主义大銀行是凶神恶煞似的大老板，社会主义銀行是有求必应的“善心菩薩”。前一句話是对的，后一句話是不确切的、片面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銀行，服从党的方針政策，服从国家的統一計劃，同其他部門是分工协作的关系，是促进生产发展和流通扩大的一种工具。同时，社会主义的国家銀行，不仅有促进和服务于生产和流通的一面，还有監督的一面。必要的監督，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扩大。生产决定信貸，信貸反过来也影响生产，促进生产。把社会主义銀行看成是只讲服务不讲監督的有求必应的“善心菩薩”，那是片面的、錯誤的。上面所說的借了銀行的錢必須按期如数

归还，如果違反信貸紀律，銀行有权給予必要的信貸制裁，直至停止发放貸款，就是銀行实行信貸監督的一个重要方面。銀行放棄監督，就是放棄自己应有的职守。

銀行对国民經济各部門，各企业进行監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就是及时反映它們的經濟活动情况。銀行要經常向領導机关提供資料，編送报表。报表不用很多，也不要很复杂。例如，一張工商貸款到期不还的单位名称和拖欠数字表，一張完不成利潤計劃和亏损企业的单位名称与有关数字表，一張各单位工資計劃数和实支数对照表，諸如此类，就可以說明很多問題。銀行是否起到应有的監督作用，是否取得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重視，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一个重要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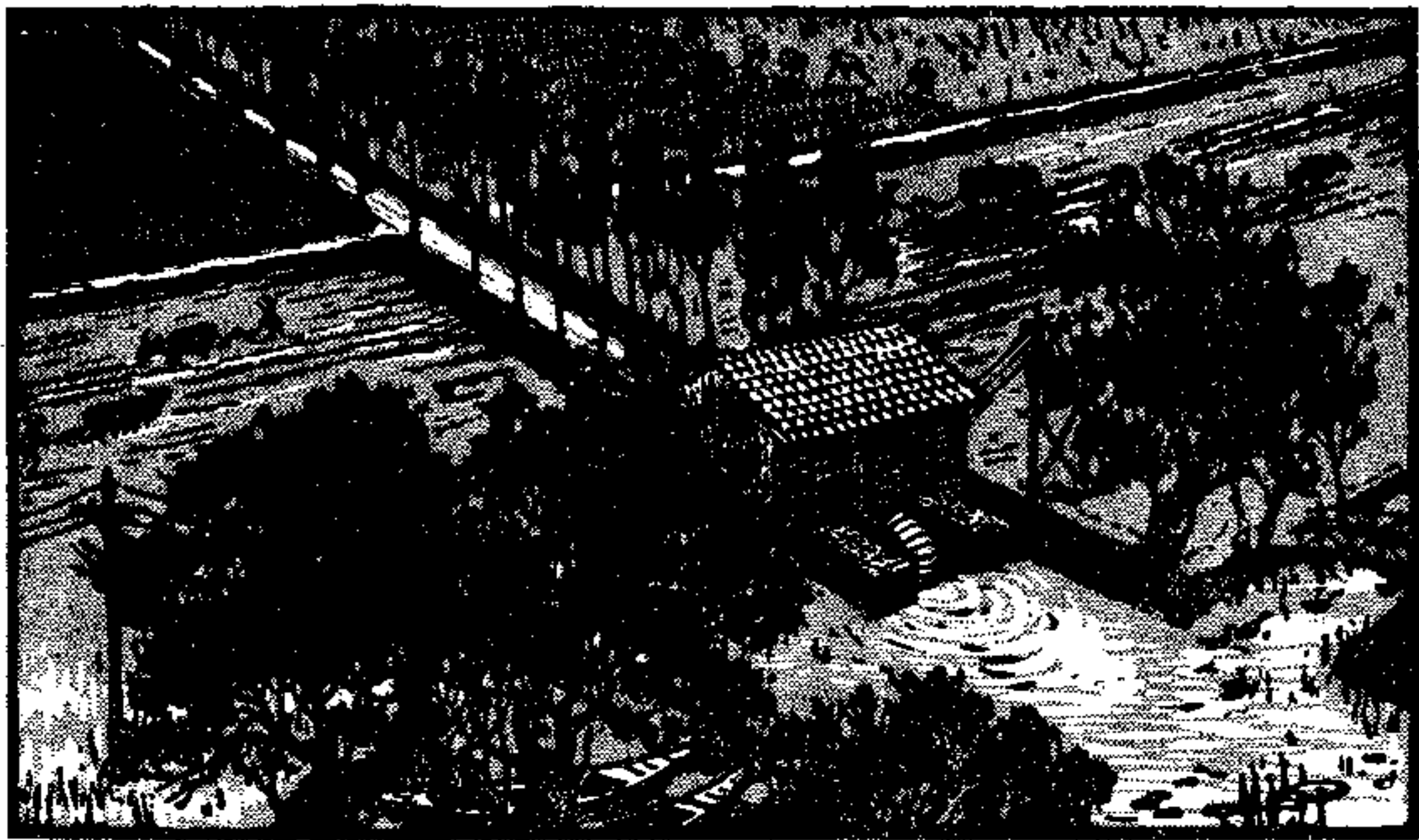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規模巨大、遍布城乡而又集中統一的国家銀行，是全国唯一的信貸中心、結算中心、現金出納中心和貨幣发行中心。全国的信用活动、結算和現金收支，都集中于国家銀行来办理。銀行按照生产和商品流轉的需要，把資金貸出去，收回来，再貸出去，再收回来，不断地流动和周轉。这种流动和周轉，反映着生产、采购、銷售、儲备等經濟活动的各个方面，反映着各地区、各部門、各企业每个环节的經濟活动。正如列宁所說，“只有实行銀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往来流动的去向，以及这种流动是怎样发生和在什么时候发生的。”^①

^①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1頁。



对經濟生活实行有效的领导和监督，必須注意利用銀行这个具有很大敏感性的“晴雨表”。例如，合理地分配劳动力是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一个重大問題。各个部門工資基金的增减变化，这是劳动力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在銀行每月的現金收支表上，可以清楚地表現出来。又如，生产和消費是否平衡，通过銀行关于貨幣流通情况的报表，貨幣出籠和回籠的变化，可以及时地反映出来。再如，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供、产、銷是否协调，經營状况如何，通过銀行每月的信貸报表，通过各个行业、各个企业貸款的增减数字，以及是否按期如数归还的情况，便可知

其梗概，发现問題。来自銀行的报表，虽然还不能直接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和怎样来解决，但是，它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如果銀行能够在报表之外，經常提供簡要的分析說明，那末，就可以使經濟领导机关更多地了解有关的情况，有助于問題的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千头万緒的經常变化着的經濟生活，从銀行这面“鏡子”里可以看出許多重要情况和問題。我們既然已經有了这样一个現成的观察經濟工作的“仪表”，那末，就应当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应当认真研究銀行的各种报表和資料，以便把我們的經濟工作做得更好，把社会主义建設推向前进。



电 灌 站 (木刻)

莫 測



历史剧三题

戴不凡

编演历史剧不能离开现实

写历史剧首先就有个取材问题。剧作家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自己生活的时代和阶级的需要，到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选取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题材来写戏。当然，一个戏的成败，主要看它是否写出了深刻概括生活的典型人物；但是，看一看纪君祥在赵宋亡国以后写《赵氏孤儿大报仇》，孔尚任在清初写明朝亡国故事《桃花扇》，就可以看到满城争唱的历史剧，它的题材总是那个时期的人民群众最感兴趣、最为需要的。

今天观众对历史剧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大家喜欢看描写古人爱国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剧目，希望在舞台上更多地看到古代人民群众的形象，但是也喜爱看描写封建阶级杰出人物的好戏。封建阶级有它的上升和发展时期，在历史上也曾做过许多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事情，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在舞台上实事求是地描写他们，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中，吸取正面的或反面的教育，这也正是无产阶级尊重历史的具体表现。

我们要写历史上光明的事物，但过去那

些黑暗腐朽的东西，如果用正确的观点加以处理，不是让人看了迷恋而是厌弃它们，不是让人看了泄气而是增长斗志，这

又有什么不好呢？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固然需要写，但是类似民间传说《打金枝》那样的小故事，不也是很足以启发和娱乐我们么？正剧和喜剧是观众需要的，“起义戏”、“开国戏”固然可以鼓舞人心，但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时代的观众就不再需要看悲剧了。我们也需要历史悲剧。这不但是适应观众不同口味的问题，而且看了像《甲午海战》那样激动人心的历史悲剧，既可以激发我们对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的仇恨，又可以激励我们去争取祖国的美好未来；既可以使后人从前人的悲剧中得到经验教训，又可以从邓世昌等人的昂扬斗争精神中收到鼓舞人心的效果。

历史剧题材的选取，在今天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凡是能够鼓舞和教育人们前进的，向上的，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的修养、知识的丰富、美学趣味的提高等方面有益的，应当说，都是观众所欢迎的。

题材是重要的。但是同样的题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处理。纪君祥写赵氏孤儿故事时强调大报仇；明朝人写这个题材变成了强调义气的《八义记》。时代不同了，剧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不一样了，观众的兴趣和需要也不一样了，今天的剧作家重



新处理这个题材时，就不一定把重点作同样的安排。秦腔《赵氏孤儿》不正是因为故事中的主人公那种舍己为人、坚忍不拔的英勇精神被强调出来，才分外使我们激动么？

历史剧要古为今用，这主要表现在究竟拿历史上的什么东西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服务。具体来说，就是选取什么样的题材和强调突出这一题材的什么社会意义来教育今天的观众。吴越相争的故事在二十四史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但它能成为今天各地竞演的剧目，正因为勾践那种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精神，能够砥砺我们前进。从这里来看，历史剧作家除了必须精通历史以外，积极地关心现实生活，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首先就可以帮助剧作家更好地考虑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强调其中的什么。

剧作家对自己时代的道德标准、生活风尚、美学观点和观众的心理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够作出打动观众心灵的艺术处理。剧作家只是一味去迎合、迁就观众，当然不好，但是，对观众的爱和憎恶茫无所知或知道得很少，要想观众看戏时为之动容，这是很困难的。剧作家认为可惊可愕可笑可乐的，不一定是观众认为可惊可愕可笑可乐的；剧作家认为非告诉观众不可的，不一定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大至于史实的剪裁取舍，人物、场面的处理，小至于一个上下场的安排，甚至于一句唱词中的平仄阴阳，莫不皆然。历史剧作家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不能不考虑观众，因而不能不积极关心和了解现实生活。

历史人物俱往矣，却要把他们的音容笑貌在舞台上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这除了有赖于作家根据历史去研究、分析、体验，发

挥想象，惨淡经营以外，紧密地和现实生活相联系，将有助于克服创作过程的这个困难。历史不会一模一样地重演，今人今事和古人古事当然不同，但是，通晓今天的人情世态，将有助于深刻体验过去的人情世态。一个剧作家置身于今天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列中，比起苦思冥想百年前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情绪，其深刻和亲切的程度是不同的。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单靠书本记载去分析、体验古人的生活，常常容易流于“书卷气”；单靠戏曲舞台上流行的套子去设想古代丰富的生活，也往往易入窠臼而带“科场气”。要在舞台上深刻表现古代各种各样人物的真实思想感情，写出容光焕发的饱满人物形象，剧作家除了“博古”以外，更需要“通今”。田汉同志曾经谈起：“我若没有在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搞戏剧运动的生活，就很难写出《关汉卿》的某些场面。”虽然，田汉同志这里所说的是参考他本人在旧社会的生活，去写更古老的旧社会生活，这是有其方便之处的。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情况与过去根本不同，但是，一个作家对今天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在创作时毕竟有利于开拓他的思路，勾起他的想象，帮助他的虚构，丰富他的文采。

为现实不能忘了历史

历史剧是向观众进行历史教育的一个有力武器。在历史剧创作中，我们强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因为只有这种观点，才能够真正如实地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判明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揭示历史发展的真相。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只能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研究，而不能随意去改变它。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只有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观察和描写历史，才能从其中得出对后人有益的东西，使历史的真实性和教育性得到和谐统一。我们看京戏《将相和》的时候，看了蔺相如那种不计私怨，团结同僚，共为国事的精神，以及廉颇知过改过的诚挚态度，不是能够获得很多启发和教育么？剧本没有去任意改动人物的阶级成分，也没有把人物的精神面貌写得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但是，它给人的教育却是意味深长的。不使历史人物丧失他们的时代特征，不要模糊古今人物的界限，在历史剧创作中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历史剧的教育作用只能是“历史”的。也就是说，一定要从刻苦钻研、分析历史现象出发，从其中得出足以教育后人的东西。离开了历史，那就很难发挥历史剧的教育作用。

我们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真实地描写历史，但不是无目的地写真实。专门写一个戏去表现某个历史英雄人物也曾做过一些“缺德”的事情，比如写史可法打过农民起义军，这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戏是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某个历史人物的毕生行事无分巨细地表现出来的，因此，表现他的哪一些，以及用俊扮还是丑演，应当看一个历史人物毕生行事的基本方面，这才会使得观众对他为人的好歹获得一个总的正确印象。在舞台上，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要力求做到恰如其分。不适当地美化古人，正和不适当地贬低古人一样，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之所以值得在舞台上歌颂，是由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

条件下，做了比他们同时代人或前人更多的好事情，而并不因为他们的一切方面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剧作家看到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进步性，也看到了他们的局限性，但在剧中却采用“取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描写方法，只去表现某些封建统治阶级的贤臣、良将如何为国为民，而不把他们的为国为民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和一定的阶级地位上去描写，那就难以写出完整生动的人物形象。譬如说，把史可法写成为心目中丝毫不把皇帝放在话下，并不忠于朱明皇朝，那么，不仅他一生的行为逻辑无法得到解释，而且，这个没有忠君观念、没有皇权思想的官员，势将仿佛生活于真空之中，使人难以相信他还是封建社会里的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描写了史可法对朱明皇朝的忠诚。在痛哭誓师的时候，他一方面“哭声百姓”，一方面却高呼“皇天列圣”，“哭声祖宗”；当我们看到他“哭的俺一腔血作泪零”的时候，感到孔尚任是把这位封建时代民族英雄形象具体地描写出来了。因为，在“北兵已入淮境”的时候，他所要保卫的那“明朝一座江山”，事实上正是当时人民的江山；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代，他忠于朱明的国家，事实上也是具体地表现了这位封建阶级英雄的爱国思想。不仅如此，孔尚任在描写史可法的时候，甚至还写出了他性格上的巨大缺点，但也并没有因此减轻这位民族英雄的砝码。以《争位》来说，剧本就写了江北四镇为抢地盘而打得唏哩嘩啦，可是作为督师的史可法却束手无策，最后只得出“一告示调停”。这正是这个历史人物不能“广集群力，善调四镇，不令生嫌”（张岱：《石匱书后集》）的生



动写照。但是，由于孔尚任是借以国事为重的史可法的无法调停，来突出四镇的骄横跋扈、不听节制，而不是自然主义地去写他的缺点，所以不仅不使人感到史可法不可爱，相反，却把这位忧国忧民的英雄人物的具体性写出来了，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史可法后来只能以三千孤军死战扬州，和他自己不善于节制的缺点，也多少有着必然联系。如果回避这些缺点，那么，史可法的悲剧性格是难以得到合乎逻辑的描写的。历史人物史可法一生的基本方面是好的，是爱国家爱民族的，但他毕竟是封建阶级的一位英雄人物，所以他身上有忠君思想和性格上的缺点，并不奇怪。因为三百多年前的这位英雄人物本来面貌就是如此。孔尚任面对着这种复杂的生活情况，并不回避人物的缺点，而是作了具体的描写，所以显得真实可信。他是把笔墨集中去歌颂史可法的爱国精神，所以才使这个人物令人可爱可敬；同时，他真实地具体地描写出史可法性格的时候，也未始不可供后人作为殷鉴：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不能太书生气，太软弱。

我们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强调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评价。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剧作家才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应该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舍弃什么，强调什么。但是，如果只拿着某种科学结论，例如某某历史人物有五条进步性和三点局限性，就认为可以捏合起一个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这就是用科学结论来代替艺术创作方法了。要写出丰满动人的艺术形象，还必须具体地懂得古人是怎样生活的。要写出史可法的真实形象，就需要像孔尚任那样，抓住这个人物的行动逻辑，

看出他“心在明朝”。因为史可法一心为明朝江山，这就使得他和“心在崇禎”的左良玉及“心在弘光”的黄得功（所谓“南朝三忠”）有所区别，这就是他没有投入当时内哄漩涡中的原因，而显得他是南明真正的爱国将领。正因为他“心在明朝”，所以他虽反对迎立福王，但福王既立，他又忠于福王；因为他“心在明朝”，所以他忠于福王，却又不和为个人私利而拥立福王的马士英、阮大铖那一伙奸臣一样，反而被马阮所排斥。正因为他为的是明朝江山，所以即使被排斥，即使只有三千不愿战的孤军，他也要动员大家起来拚死一战。显然，如果他如此忠心耿耿地为着明朝江山，不是在“塞马南来”的时刻，而是在清军入关以前，那他很可能变成人所共弃的宁武关前的周遇吉；他是在清军南下力战以后沉江死节的，所以他才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位民族英雄。一个人做一件事，总是有他的原因的，总是按照他（由阶级地位和个性所决定）的性格逻辑，活动在一定的环境（由人与人所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要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么，只有设身处地去研究他们的生活。“撰曲者不化其身于曲中之人，则不能为曲”（明·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这是一个困难的工作，但也是活古人于舞台的不二法门。

一个作家不懂生活，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一个历史剧作家如果不去认真研究历史现象，也很难写出好的历史剧来。孔尚任写作去他未远的南朝新事时，除了访问遗老以外，单是他自己列出的征引书目就达二十种；近年出现的众所公认的历史剧佳作如《关汉卿》、《甲午海战》等，剧作者也是阅读



和研究了大批典籍記載以后才动笔的。这些成功的經驗說明，要写出好的历史剧，就必须研究历史，熟悉历史。一位具有科学观点的作家，在精通历史以后，才能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去写出对观众有益的作品。

尊重历史不能否定艺术虚构

写历史剧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才能反映历史真相，才能使剧作真实动人。舞台可以起到某些普及历史知識的作用，但不可能把傳播历史知識的全部責任都由演員来担任。剧作家写历史剧是要用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来显示历史的意义，如果忽视了戏剧艺术的职能，去要求一个戏把某一段历史事实都写进去，这就很容易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孔尚任在写史可法的时候，就没有把史可法晚期的全部行事都写进剧本里去。如果不是根据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把历史事实无分巨細地都写进去，其結果不仅会使作品橫生枝蔓，而且也会导致破坏人物形象和淹沒主題的后果。艺术作品总是需要进行剪裁，才能够更集中地深刻地反映生活。

历史上的許多真人真事能够流傳下来，并且能够引起剧作家的兴趣，总是因为它本身有足資談助之处，有的甚至于还是千載之后犹令人感到凜凜然有生气的事情。生活虽然是动人的，可毕竟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比较粗糙的，需要艺术加工才能发出光彩。剧作者之所以被誉为艺术家，他的本領也就在于能用生花妙笔，把这些动人的史事，通过艺术形象具体地加以描写，使它比原来的生活更真实动人，使人情不自禁地受到感染。

历史上文天祥从容就义的場面，本来就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在周信芳同志編演的剧本中，大体上根据史实，又虚构了伯顏丞相到獄中劝降，接着，还把忽必烈前数日召文天祥入殿劝降的史实，改为忽必烈此刻亲蒞獄中劝降，而文天祥毫不为动。再加上文夫人探監的穿插，这一来就把文天祥临刑前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愛国家愛民族的英雄形象，更大地树立在观众面前。如果没有这种艺术渲染，如果要求剧作家拘泥于书本的記載，一切都按照真人真事去写作，在这里不运用集中、虚构等等手法，那么，文天祥的英雄形象，就很难如此动人地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剧作家如果只是“按史敷陈”，沒有艺术概括的工夫，是写不出深刻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

戏剧艺术家为了更真实深刻地反映生活，显示生活的意义，免不了有艺术的虚构。一位严肃的历史剧作家从事創作的时候，总是由于他感到那段历史很有告訴給別人的价值，他决不会去更动历史的基本情节和人物的基本面貌。一位有識見、有理想的剧作家，为了要把自己的感受更鮮明生动地告訴給观众，他在写历史剧的时候，就不能不在不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人物的性格邏輯的原則下，运用集中、突出、夸張以至于虚构等等方法。在对生活进行概括的时候，艺术家完全应当張开想象的翅膀，大胆虚构。我們反对的只是那种离开上述原則的所謂“虚构”。而合情合理的想象和虚构，能够更集中更概括更深刻地反映历史真实，这对于优秀的剧作來說，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在戏剧創作中，从来不曾有一部真正成功的作品是被二十四史的記載捆住手脚的。即以《桃



花扇》來說，它也只是在大体上符合历史，有一些具体情节和史实还是有所出入的。举史可法之死为例：孔尚任在描写中就更动了历史上的实际日期，把揚州之失写在福王从南京出奔之后，以便表现史可法在战败后还想去找福王。关于史可法之死的历史記載虽然很不一致，却从来沒有人說他逃出揚州后还想到南京去找福王。不过，对于这位剧中的英雄人物來說，他一心为着明朝三百年基业，在揚州战败后犹不灰心，却是情理中可能有的事；要找福王的史可法在路上听说福王早已逃走了，才逼得无路可走，壮烈沉江，也是符合人物当时的行为逻辑的。而对于昏庸无能，荒淫纵欲的福王來說，在左良玉率师东下除奸的时候，又听得揚州连夜告急，因而就仓忙逃走，也是符合他性格的发展的。这样处理，比起按照历史記載的福王在揚州失守以后半个月才逃走，更突出了这个人物的本质。这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处理，既突出了忠肝义胆的史可法的巨大悲剧，也进一步深刻地揭露了南明統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它虽然改动了历史上的实际日期，也虚构了一些情节，却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面貌更真实深刻地揭露出来。如果拘泥于史实，不敢放手去写，那么，这里显然难有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就某些在史书记載中缺少戏剧情节的历史人物來說，如果要把他們搬上舞台，虚构一些事件那更加是必要的。话剧《关汉卿》的情节，几乎全部出于剧作家的想象，但这个戏中所描写的事件，既是那个历史时期所可能发生的，又是剧中人物所可能做的，因此不能不使人信以为真。而通过这些虚构的情

节，历史人物关汉卿“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的真实性格，被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假如戏剧家不进行大胆虚构的話，可以說，类似关汉卿这样的历史人物，即使能对他作出科学评价，但也是无法編成戏的。

历史剧原是借历史来写戏。要了解历史事实不能不依靠文字記載。可是，在人民群众处于被剝削的时代中，各种典籍包括当时最进步的历史家的記載，都免不了有一些偏見和缺陷；对于历史的某些傳統看法（包括大体上正确的，以及很多錯誤的看法）还往往深入人心。因此，剧作家在創作过程中，一方面要吸取历史学家研究的科学成果，加以融会貫通；同时自己也还需要尽可能的掌握各种有关史料，运用科学观点，发挥独立思考的精神，审慎研究，辨其真伪，审其是非，对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只有在这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够出現面貌嶄新的历史剧。当然，只有科学的分析研究，而忽视艺术創作的特点；只注重历史事实的真实，而忽略艺术的真实，那也不一定能够写出动人的历史剧来的。总之，为了戏而不顾历史，那将不是历史剧；为了历史而不顾戏，那也将不是历史剧。历史和戏，在历史剧中必須而且是可以統一的。

历史剧的創作，是一个广闊的領域。怎样才能够写出更新更美的历史剧，这需要在实践中經過各种不同途徑去探索，鼓励剧作家們作各种不同的尝试，并充分交换意見，进行实事求是的討論；同时，还需要善于总结这方面的創作經驗（包括傳統剧目的整理和新創作的历史剧），以供大家学习借鉴。这样做，对历史剧的繁荣发展，是有益处的。



— 古典文學理論中的風格問題 —

劉綏松

文學作品的風格問題，是文學理論中一項重要課題。在我國古代文學理論著作中，風格一詞雖出現不多，但風格在文學創作上的重要意義，却早就被重視和討論到了。

風格問題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的形成和發展關係到一系列比較複雜的理論問題，同時也因為我們的一部絢爛多采的文學史，乃是由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作家和作品構成的。藝術風格的熔鑄，是作家創作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風格是什麼呢？風格是作品的風貌和格調，它是作品的外在的表現；但那是誠于中而形于外的，是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特征統一的表現。因此，不能也不應脫離作品的思想內容來追求獨特的風格，不應脫離作家的創作思想與作品的具體內容來研究作家和作品的風格。我國古代一些理論家，當他們論及文章風格的時候，常常是從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觀點來進行探索和闡述的。

早在漢代，王充就說：“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論衡·超奇篇》）意奮筆縱，文見實露，這是對作家創作過程

的簡要概括；而“外內表里，自相副稱”的結果，則是作品風格的形成。這個道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得更充分。《體性》篇說：“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

情與理是蘊藏在作家內心的東西，而言與文則是它們的表現。作家只有由於外界事物的啟示和影響而情動理發*，然後才有創作的要求。就創作的過程來說，是“沿隱以至顯”，即把作家蘊藏於內心的東西化為顯露於外的文章；就作品的本身來說，則是“因內而符外”（即“外內表里，自相副稱”），也就是內容與形式的諧調與統一。作家對外界事物的感受和認識不同，作品所要表現的內容也會隨之而異，再加上藝術方法和表現形式的差異，於是就很自然地出現了不同作家、不同作品面目各異的藝術風格。同是登臨抒感，王粲的《登樓賦》與鮑照的《蕪城賦》異趣；同是摹寫山水的壯麗，謝靈運、謝朓的詩風不同。杜甫、岑參、儲光羲、高適都

* 《文心雕龍·物色》說：“春秋代序，朔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蕩。”鍾嶸《詩品》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都是說外界事物對於作家情思的影響。



有登慈恩寺塔的诗，但是“岑、儲两作，風秀熨貼，不愧名家；高达夫（适）出之簡淨，品格亦自清堅；少陵則格法严整，气象峰巒，音节悲壯，而俯仰高深之景，肝衡今古之識，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賢，雄視千古矣。”（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这真是“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異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蕭子显《南齐书·列傳第三十三》）。

刘勰超越前人的地方，就是他从作家的“情性”和“陶染”两个方面探索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情性”是作家的才能和气质，“陶染”是作家的学識和摹习。才气是作家的稟賦，学习是作家的艺术素养*。作家才能的庸儻决定他的作品“辞理”的庸儻，气质的剛柔决定他的作品“風趣”的剛柔，作品“事义”的淺深取决于作家学識的淺深，作品“体式”的高下决定于作家平日摹习对象的高下。作品的風格正是它的“辞理”、“風趣”、“事义”、“体式”这四者統一的表现，所以说它是“情性所鑠，陶染所凝”。作家的情性和陶染各不相同，因而他們的風格就不能不“其異如面”^①。如果一部作品沒有打上作者的情性和陶染的鮮明印記，是决不会具有独特动人的艺术風格的。

作家不同的才思决定作品不同的面貌，在刘勰之前的葛洪，就有过同样的看法。他说：“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屬文，参差万品。”（《抱朴子·外篇》）但刘勰却不把作品風格的形成完全归因于作家稟賦的情性（当然，形成情性的因素也是很复杂的；但在刘勰的那个时代，我們不能要求他对它作科学的解釋），他重視了作家的陶染，而且

还提出了“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的重要主張。学习的对象必須是前人的成功之作，因为始习不慎，就可能导創作于歧途；“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移”，便是很确切的比喻。善于学习，作家的創作个性和才能，才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发展，也才可能运用自如地創造自己的艺术風格。

在这里应当加以說明的是，“摹体以定习”，这只是說，在开始练习写作的时候，应该慎重选择学习对象以端正写作道路，为后来富有独创性的創作准备基础，并不是主張始終刻意摹仿，以致貌似神亡，沒有自己的特色。文学史上虽曾有过这样的现象，不同时代或者同一时代的某些作家，由于政治見解、生活态度和文学主張相近，互相影响和学习，因而他們的艺术風格很相类似，成为一种文学流派；但是同一流派的作家，也总各有其特色，而并不互相雷同。白居易和韓愈的诗都淵源于杜甫，但是韓則硬語盘空，白則平易近人。韓門諸子虽然都以“吐奇惊俗”为風尚，但是韓愈的诗風雄渾，而他門下的孟郊、賈島，則一“寒”一“瘦”，各有特点。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从作家本身来看，可以說是“賞好異情，故意制相詭”（沈約《宋书·列傳第二十七》），作家的艺术好尚不同，所以作品的构思和遣詞互異；就文学发展来看，則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蕭子显《南齐书·列傳第三十三》），作家如果陈陈相因，缺乏独创和革新，則后来的作品将永远不能

* 《文心雕龙·事类》說：“才自內发，学以外成”，即是此意。

① 《文心雕龙·体性》。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見《文心雕龙》。



跨越前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勰又说：“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参伍相变，有因有革，这就是有摹习又有创造，有继承又有变革。只有这样，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发展无穷。“凡旧”是文章的大患。“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此中道理，是很值得思索玩味的。

二

形成文学作品不同风格的原因，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家看来，还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风格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文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隆替与民生苦乐不能不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从而影响和形成这一时代文学作品的特殊风貌。《毛诗·关雎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应该说已经接触到这一问题了。到了刘勰，他根据对历代文学现象的深入研究，更提出了“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重要规律。在《文心雕龙》中，除了《时序》篇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而外，在其他各篇中论及文章风格的地方，也往往联系到作品产生的时代来加以考察。

文章风格与时代的关系，刘勰大致认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文章的风格与世道的治乱有关。他是这样来观察周代的诗歌的：“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邶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离》哀。”由于周初的政

治“德盛”、“化淳”，所以便出现了“勤而不怨”、“乐而不淫”的诗风；到了平王东迁前后，民生雕敝，宗国残破的现实，又使得当时的诗歌有了愤怒和哀怨的情调。我们今天虽然不完全同意刘勰对某些诗的分析，但他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来探讨作家作品的风格，却是应该肯定的。他是这样来论述建安时代的文风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志深而笔长”，“梗概（即慷慨）而多气”，是说诗人寄慨遥深，词气高亢。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苦寒行》等诗以及当时其他诗人的一些作品，的确具有这样的风格，而这正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第二，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也会影响到这一时代的文学风格：“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这是说，老庄思想和清谈风气对于当时的文风有影响，“因谈余气，流成文体”，即指此而言。钟嵘《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看法完全相同。又如：“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又近；李斯之奏驩山，事略而意逎；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这又是将文章风格与作家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而“政无膏润，形于篇章”一语，则更从不同角度接触到了文章风格和当时政治的关系。

文学作品既是时代生活的反映，时代变

* 此说出自《礼记·乐记》，不过《乐记》是说音乐，而此处则用以说诗。



了，文学风格也就不能不随之而变。“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确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因为这样，所以文学上的崇古拟古，效颦学步的风气便应该遭到反对。王充《论衡·自纪篇》说：“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就是对文学上拟古风气的—个绝好的嘲讽。唐代刘知几有一段话更说得透辟：“夫天地久长，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事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二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而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史通·言语篇二十》）这是根据刘勰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论点与历代文学“质文代变”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

三

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除作家的主观条件（即“情性”和“陶染”）与时代特色两个重要因素而外，同作品本身的体裁也有关系。关于这一点，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论述的很多。曹丕的《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的《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诘。”这都是说，不同体裁的作品应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根据这种看法讨论了各种文体的风格。

不过，刘勰虽是依据体裁以论风格，但

并不是专从形式着眼，而是首先从这些不同体裁所表现的不同内容来立论的。一定的内容须有一定的体裁来表现它，而一定的体裁则必具有一定的风格特点。《诠赋》篇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秣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作者登高作赋，乃是由于俯瞰万物，内心有了强烈波动，所谓“睹物兴情”，就是这个意思。没有“雅义”，就不能抒写情怀；缺乏“丽词”，便很难描画景物。因此“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就成了赋这种文体的风格特点。《铭箴》篇说：“箴全禦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要以辨，其摘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箴是为防止过失而作的，所以文词应该“确切”；铭有颂扬的作用，所以体式应该“弘润”。而叙事翔实明辨，措词文简意深，则又是这两种文体的共同特色。《论说》篇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辨正事理的是非得失，乃是论文的任务，所以它必须抓住主要问题，不枝不蔓，深刻而周详地阐述道理，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隙。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刘勰在讨论各种文体风格特点的时候，紧紧地抓住了内容的特点，而且还指出了文体的风格特点正是从文章内容的特点而来的。

刘勰虽认为一定的体裁应具有一定的风格特点，但他并不认为这个特点是可以经常



不变的。根据作者的情性与学习的不同，同一体裁的文章，其风格也不能不有显著的差异和变化。在《明诗》篇中，他一方面认为四言诗以“雅澗为本”，五言诗以“清丽居宗”，但接着就说：“华实异用，唯才所安”。又说：“诗有恒裁，思无定位”。**体裁是固定的**，故说“诗有恒裁”；作者的才思是因人而异的，故说“思无定位”。虽是运用同一体裁，但作者才思不同，即会出现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个道理，在《通变》篇中，有进一步的说明：“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教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指出文章体裁与风格的常与变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名理有常”，所以同一体裁的作品，其风格特点有共同的一面；因为“通变无方”，所以同一体裁的作品，其风格也必会因作者和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异采。因为“名理有常”，出自同一手笔的作品，也会因体裁不同而风格略异；因为“通变无方”，不同体裁的作品也会因为出自一人的手笔而具有由于作家的思想、性格、才思和学习而形成的一贯的风格。只有常而无变，则文学势必风貌混同，而且还将停滞不前；有常而又有变，然后才可以“新声”泉涌，永不置竭，“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四

在文学园地里，虽然因为“其异如面”的文章风格而呈现出“云谲”“波诡”的情状，虽

然“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葛洪《抱朴子·外篇》），但在我国古代理论家们看来，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并不是同样有益于人们，因而人们应该给予同等的喜爱和评价的。《文心雕龙》概括不同风格，分为“八体”，表面上虽无所抑扬，但从对各体含义的解释以及全书衡论作家优劣的地方看来，什么值得提倡，什么值得反对，刘勰的意见还是灼然可见的。其他各家论文之作，也无不都是这样。总起来说，他们的意见大致有下列几点：

第一，崇自然而抑雕削。文章既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则文章便当具有自然的风格。《文心雕龙》说，文章的“体势”，应如“机发矢直，澗曲滯回”一样，饶有“自然之趣”，作者如果能够“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根据文章所要表现的内容来确定体裁，然后依照体裁的特点来形成气势，则文章风格或刚或柔，莫不具有“自然之势”；如果作者舍本逐末，不是“为情而造文”，而是“为文而造情”，则虽刻意求工，“雕削取巧”，也不会有什么动人的艺术力量。《情采》篇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饰容”的“铅黛”是需要的，但动人的“盼倩”则是“淑姿”所固有；“饰言”的“文采”是不可缺少的，但真正的“辩丽”则必须“本于情性”。“质”固“待文”，而“文”实“附质”，这里有本末和主从之分，是不容混淆、颠倒的。

第二，求简约而避繁缛。文章的繁简，须视文章的内容而定，如果“字去而意留”，则简约为尚；如果“辞殊而意显”，则丰赡亦佳。同时，文章的繁简，又取决于作者的才性。“谓繁与略，随分所好”，“思赡者善敷，



才繁者善删”，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然而文章到底“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譬如“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所以陆机说：“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榛楛之勿剪”，“庸音以足曲”，是文章的大忌。因为文辞繁缛，不仅容易“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文赋》），而且“采滥词诡，则心理愈翳”，所以“剪裁浮词”就成为作家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功夫了。陆机在理论上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创作实践上却不能完全做到，他的有些作品“諛词弗剪，颇累文骨”，刘勰说他“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实在是很有确切的评断。

第三，贵含蓄而忌浅露。文章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通过它，作者思想和感情才能够为读者所接受。这就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章必须耐人咀嚼、寻味，然后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灵，所以文章又最好是有“文外之重旨”。《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这就是说，文章须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如果文意浅露，不耐思索，它的艺术力量就显得微薄了。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说文章应该：“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殫，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辩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就是对于含蓄的十分确切而形象的说明。

第四，重明朗而轻晦涩。含蓄与晦涩有别，而明朗也并不是浅露。如果文章本无深意，而仅以僻字拗句文其浅陋，则又是值得

反对的不良倾向了。所以在贵含蓄而抑浅露的同时，我国古代理论家又重明朗而轻晦涩：“晦塞为深，虽奥非隐”。文章如果要风格明朗，首先必须“规范本体”，做到“纲领昭畅”。“纲领”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文章的结构和布局。如果一篇文章在艺术结构上犯有杂乱和松懈的毛病，那么，就是有好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显豁而突出地被表现出来。因此，“附辞会义，务总纲领”，而“纲领”则必以“昭畅”为主。其次，措词造句必须确切、生动。“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如果一篇文章，在语言上不是“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也不可能具有明朗流畅的艺术风格。因为“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作者不是句斟字酌，而想篇章的彪炳、明靡，那是决不可能的。

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问题十分复杂，想对它进行一个精微而恰当的区别和品评，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精者要约，匮者亦黜；博者该赡，蕪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典。”这种复杂现象的存在，不仅说明了问题的困难的性质，而且也说明了对它们进行区别和品评的必要性。我国古代的理论家因为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的观点不可能不存在着一些缺陷。尽管如此，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仍然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发展和提高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是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的。



所謂“自由的臂膀”的真相

陈 原

一、“臂膀”长在誰的身上？

肯尼迪說过，“没有一个时代比現在的詞汇更丰富了。”可不是嗎，專門从事造謠、誹謗活动的“美国之音”，也蒙这位总统賜給了一个新的“詞汇”——按照肯尼迪在庆祝“美国之音”电台成立二十周年紀念会上的說法，叫做什么“自由的臂膀”了。

当然，所謂“自由的臂膀”原不止这一只，壟断资本家御用的报纸刊物等等是照例都可以成为这种“自由的臂膀”的。

由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胡卿斯主持下的“新聞自由委员会”的一个宣言中曾經說过，“对群众宣傳的机关”，本身“就是大企业，它們的所有人是大资本家”。最近，紐約《工人周报》刊載的迈克尔·紐伯里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一百家大公司控制着全国的电视、大多数报纸和杂志。文章說，在一九六〇年，美国大企业用来資助从而左右全国的报纸、杂志和电视的三十五亿美元开銷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就是由这一百家大公司出錢的。

《华尔街日报》早就这样宣称：报纸“彻头彻尾是它所有人的一种财产”，因此，“經办报纸的主人，也和其他企业家一样，自己冒險自己承担，制造他的成品在社会出卖。”

这家报纸还发了这样一通妙論：“如果社会公众不欢迎他的主張或他发表新聞的方式，那么唯一的补救的办法是把报纸掌握在他們（公众）自己手里。”說得真好听！可是办报是要錢的。房子、紙張、机器、发行网等等掌握在富人們的手里，赤手空拳是办不成报纸的。美国共产党办的《工人日报》，就是由于經濟困难被迫停刊，只能出版《工人周报》。現在，肯尼迪政府又在援用法西斯法律“麦卡倫法”加紧对《工人周报》进行迫害。据报道，《工人周报》的主編和其他工作人員已在华盛顿受到审訊，这个周报的主編詹姆斯·杰克逊被加上所謂“蔑視法庭”的罪名判处徒刑六个月。在美国，其他进步报刊也同样經常处于經濟困难和遭受政治迫害的状况中。由此可知，美国壟断統治集团所标榜的“新聞自由”，或者如肯尼迪所吹嘘的什么“自由的臂膀”，其实质不过如列宁所說，“是富人、资本家收买报刊的自由”，也“就是资本家收买几百种报纸来制造所謂‘社会輿論’的自由”罢了。

“自由的臂膀”是怎样“自由”地发表“輿論”的呢？举个例說，失业問題在自由資本



主义时期和在壟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美国报刊上，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自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的《芝加哥论坛报》，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篇社论里，对于如何消灭失业就提出过十分“简捷”的“办法”。它在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二日写道：“将少许马钱霜或砒霜放在那些废料吃用的菜里或其他食物中，经过不长时间，这就引起了死亡；这样不啻对其他废料下个警告，好让他们滚蛋。”这是赤裸裸的毫无人性的狂言谬语，现今的美国，毕竟“文明”得多了，“自由的臂膀”虽然仍旧要捏造种种关于失业的原因来蒙骗读者，甚至还厚颜无耻地赞扬失业的好处，但是，它们一般不再采用这类过于“简单”的语言了。比方去年五月，纽约第一花旗银行印行的《每月通讯》说道：要解决“今日的失业问题，就是如何使人们催促自己去找工作……这就要求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渴望工作

的态度，而且，首先要求每一个人对为别人创造工作机会的企业组织有一种友好的政治气氛”。多新鲜！原来失业是由人们“懒惰”、“不主动”或者对资本家们不“友好”引起的，而不是由美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也是在去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竟然把失业列为美国进行战争准备的“有利条件”之一。这家周刊说，美国幸亏有五百万失业人口，才形成了“一个提供人力的水库”云云。失业人口可以为美国统治集团提供大量的炮灰，就是这只“自由的臂膀”所要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比之上面提到的《芝加哥论坛报》的“办法”，的确不是那么“简捷”，但是，阴险狠毒的程度难道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道理很简单，“臂膀”既然长在壟断资本家身上，它就只能按照壟断资本家的意志去制造产品。

二、泡制“独立”舆论的“厨房”

“臂膀”既然是长在壟断资本家的身上，那么，肯尼迪把它称之为“政府的一只臂膀”，这也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美国有一位熟知国务院内幕的柯尔盖特大学教授埃耳德证实了这一点。这位教授在一本名叫《政策机器》的著作里，运用许多事实来说明国务院是制订政策的一部强大的机器。教授讲溜了嘴，不知不觉地道出了国务院如何泡制所谓“独立”的社会舆论的秘密。用这位教授的形象的说法，国务院里有一个专门泡制各式各

样“独立”舆论的“厨房”，而这“厨房”工作起来也甚是便当，只须抓住全国二十五家最大的报刊和通讯社的记者，绝大部分报纸就会遵照国务院的方针来对读者进行欺瞒宣传。这位教授还讲到，“厨房”还派出一批一批“联络员”，去参加所有能发表“独立”舆论的什么协会、什么基金会、什么俱乐部的会议，顺便带去“国务院所能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本来应该印在国务院公报上的东西，很快就变成这些协会、基金会和俱乐部的“独



立”輿論，散发到群众中去。按照这位教授洋洋自得的供认，不是社会輿論影响了国务院，正相反，是国务院这个“厨房”制造了美国统治集团一向标榜的“独立”的社会輿論。

試把《新聞周刊》——这只“臂膀”主要是长在摩根財团身上——新近列举的美国五个“有影响”的評論員略为考查一下，人們就会对美国式的“新聞自由”得到更加深刻的印象。这个刊物举出的第一号評論員是德魯·皮尔逊，美洲六百多家报纸和美国二百多家电台发表他的“独立”評論，而这位先生却是受赫斯特系报閥所豢养的。第二号是戴維·勞倫斯，三百五十家报纸同时等待着这位評論員的議論，据說，勞倫斯跟洛克菲勒財团和軍人有很多勾搭。但是，“最有影响的”据說还是給三百家报纸供稿的李普曼，給二百家报纸供稿的約瑟夫·艾尔索普，給五十三家报纸供稿的賴斯頓。被称为美国“最大的政論家”同时又是“哲学家”的李普曼，是《紐約先驅論壇报》系統的专栏作家，他和摩根

財团有密切的来往，他所屬的报纸又和洛克菲勒財团的利益息息相关，白宫、国务院的要人以及許多外国官員都是他的“密友”。約瑟夫·艾尔索普也屬于《紐約先驅論壇报》，他的見解跟国务院“特別接近”。至于賴斯頓，却屬于《紐約时报》，这个报纸同摩根財团和洛克菲勒財团关系密切，而他本人則是国务院的熟客。在簡略地考查了以上几位“有影响”的評論員的履歷以后，不由得使人們想起做过《紐約时报》編輯的約翰·苏英頓說过的話：“紐約的新聞工作者必須曲解真理，公开撒謊，歪曲事实，辱罵人們，五体投地地为金錢服务。我們是在幕后活动着的財主的工具和附庸。我們是傀儡；財主拉綫，我們跳舞。我們的才能、本領、可能性和我們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是其他人們的财产。我們是智力的妓女。”

事情很清楚，在美国，什么“新聞自由”，什么“独立”的輿論，都不过是資產階級用来欺騙广大人民的障眼法而已。

三、向“軍营国家”推进

当“軍营国家”这个词儿第一次在美国的报纸上出現时，美国人着实給吓了一跳。“自由的臂膀”不是經常吹嘘美国是什么“福利国家”嗎？为什么一下子又出来了一个“軍营国家”呢？这已經是肯尼迪上台以前的疑云了。去年人們又在議論紛紛，佛蒙特州的参議員弗兰德斯声称，“我們現在被迫（！）将美国生活方式推进到一个軍营国家的模样了。”

的确，現今的美国是在向这个方面“推进”着。不說別的，看一下肯尼迪政府的一九六三財政年度的預算，就可見一般了。在这个預算的九百二十五亿美元的总开支中，就有五百二十七亿美元用于所謂“国防开支”，这笔支出打破了美国和平时期軍費支出的最高紀錄。其实五百二十七亿这个数字，还不是跟战争有关的全部支出。据紐約一家月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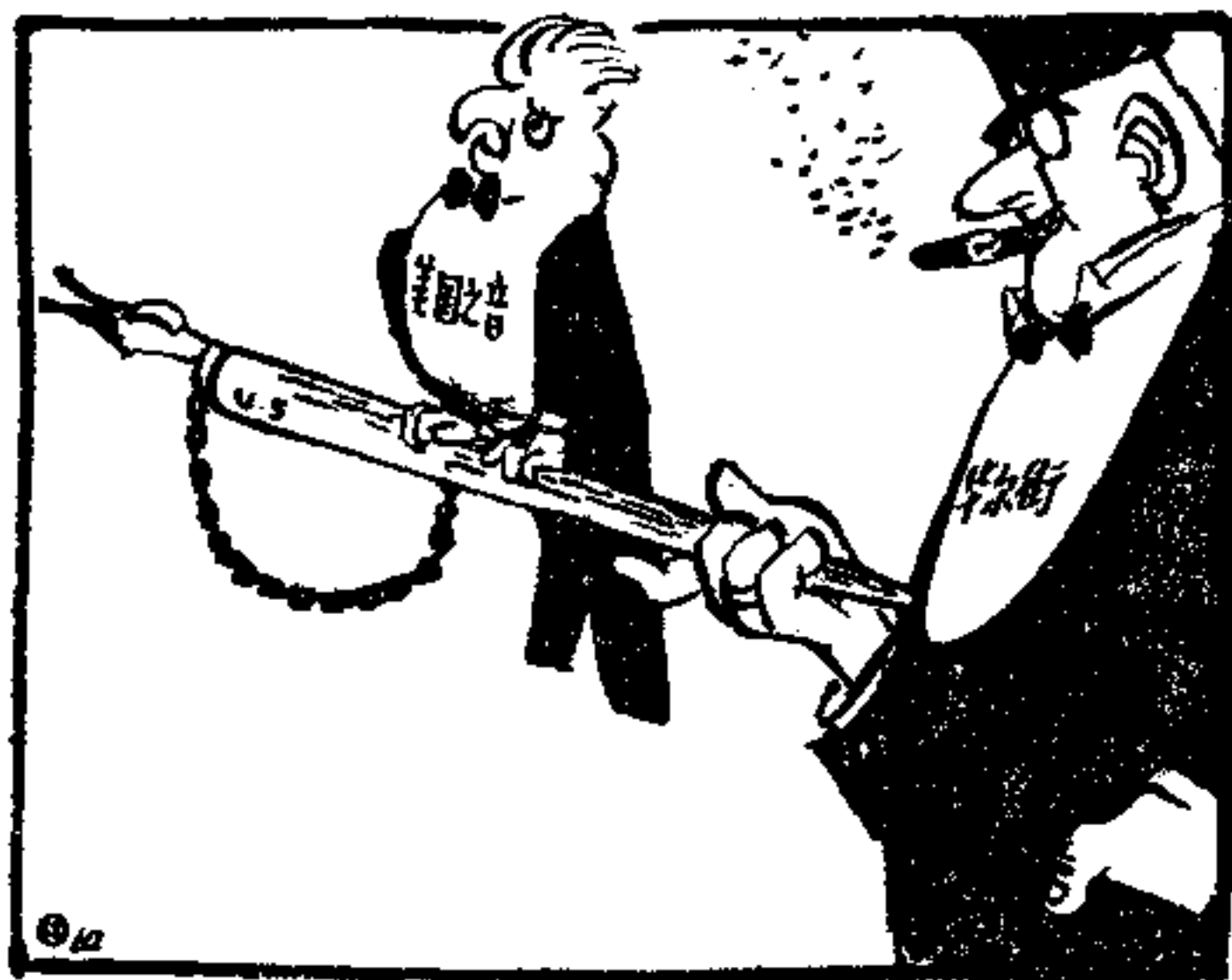
計算，如果把“过去、現在和未来”的有关项目統統加在一起，肯尼迪政府在这一财政年度中，每支出一块美元就有七角九分錢用于战争！

由这本来不存在的“福利国家”，“推进”到已經存在的“軍营国家”，当然不是美国人民所乐于接受的，于是，一切的“自由的臂膀”便立即动員起来，用种种謠言和捏造向老百姓“迟钝的”脑袋展开宣傳。为什么要增加軍事开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自由的臂膀”除了把那些国家要人們的高見搬出来加以宣揚以外，还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独立”的輿論，說什么这都是为了加强美国的“防御”能力。例如，一月十九日《华尔街日报》就做了这样的論断：“庞大和迅速增长的防御(1)費用，应该要求把不可胜数的非軍事补助費用贬到无关紧要的地位或者完全不重

要的地位。”

“自由的臂膀”为五角大楼服务，同宅为大壟断资本家和白宫服务，本来是一碼事。“自由的臂膀”生长在五角大楼的軍人身上，也并非自今日始。《华尔街日报》去年年底宣傳一位隐名的但据說是“著名的”“四星將軍”的观点——当然，这也是宣傳华尔街大老板們自己的观点——道：“(美国)軍队目前的任务不仅仅要进行战争准备，而且要向社会公众宣傳世界共产主义的威胁(1)”。既要打仗，又要宣傳，而所宣傳的“威胁”又要完全捏造出来。在“軍营国家”里当个軍人可真不容易，非文武全才不可；但也不必担心，軍人身上既然可以生长出“自由的臂膀”，这无事生非的勾当也就不愁完成不了的。

这里，还可以順便提一下这样一段頗能說明問題的插曲。也还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說五角大楼現在認識到，在美国报纸上連載的“滑稽图画故事”，比之招兵的招貼画之类的东西，还要起加倍的作用。在这些“滑稽图画故事”的主角之中，有一个名叫巴茲·沙耶的，几年来一直用海軍的冒險生活来娱乐美国讀者。忽然，这位主角的創造者——画家克倫厌倦了海上生活，他笔下的巴茲主角准备“退休”了。五角大楼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动員一批水



美国之“醫”

江 帆



兵提出抗議——怎能无缘无故在这存在着严重“威胁”的时刻脱离海軍现役？海軍当局連忙把这位画家送到太平洋上一支反潜水艇舰队去“体验”生活。果然，不久之后，巴兹·沙耶又在“自由的臂膀”上出现，这一回以他在反潜水艇舰队的惊险活动来娱乐观众。据说，这种娱乐是可以有助于让观众在

不知不觉中支持海軍預算的提高了的。

五角大楼运用“自由的臂膀”的熟练程度，并不亚于华尔街、白宫和国务院。这个既长在大资本家也长在达官显贵和职业军人身上的“自由的臂膀”，就这样努力着，一步一步地将这个国家推进到“軍营国家”的境界。

在“全民福利”的幌子下

· 張 振 亚 ·

肯尼迪上台以来，一直喧嚷着要建立一个“全民福利国家”。今年一月，他在“国情咨文”中煞有介事地说什么“财富是手段，人民是目的”、“国家是公民的仆人，而不是公民的主人”；在他提出的“預算咨文”中，又宣称，这项高达九百二十五亿美元的和平时期的最高預算“是有关我們国家福利的許多考虑的综合”。

肯尼迪是怎样关心人民福利的呢？他所提出的“預算咨文”本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預算咨文”规定，美国在从今年七月一日开始的一九六三财政年度中，用于农业、开发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建筑、劳工、医药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民政项目的开支，全部加在一起，还不到总开支的百分之二十；而用于所謂“国防开支”、“空間计划”以

及“同过去的战争有关的退伍軍人福利费和(国債)利息”等直接和間接軍費方面的开支，却高达七百二十八亿美元，約占整个开支的百分之八十，相当于“卫生、劳工和福利”开支的十四倍以上。用美国《經濟評論》的話來說，这个預算是“一个杀人能力过高的預算”。

据美国报刊透露，这样一个庞大的軍事預算，将給美国壟断資本带来丰厚的利潤——由于新預算空前增加軍事开支，在今后一年內，美国各大公司納稅前的利潤总额将达到五百六十五亿美元左右，“远远超过历史上最高的利潤水平”。現在，美国壟断資本集团，特别是那些为五角大楼备办軍事物資的大企业主們，在这种大发利市的“好光景”下，一个个正在做着“繁荣”的美梦。不



久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情不自禁地说：“这些（军事）订货将流向大约一万八千家基本合同商……整个工业都受到影响。增加两个陆军正规师的决定意味着将给予食品、成衣和制鞋工业以大量订货。对军备的沉重开支已成为我国钢铁工厂生产率中的重大因素。底特律（汽车工业中心）已经感受到成千上万辆的卡车、坦克和其他军用车辆订单的影响。建造新的舰只和改装旧的舰只的造船厂正在做着繁荣的生意。从七月开始的新的一年的订货是：建造二十九艘新舰，并对三十三艘以上的旧舰进行大改装。”

肯尼迪把“全民福利”这类好话翻来复去地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到头来只不过是连骗带压地要美国人民把裤带勒得更紧一些，为垄断资本集团牟取暴利“承担沉重的负担”和“作出特别牺牲”而已。虽然目前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年的直接税和间接税负担已经达到二千五百美元左右，但对肯尼迪政府来说，还是难以应付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军事开支的需要，更难以满足垄断资本家们要求取得最大利润的欲望，于是肯尼迪一直在叫嚷着要实行“赋税改革”，向美国人民进行更多的搜刮。在他提出的预算收入计划中，仅仅直接落到广大人民头上的“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两项，就将增加四十六亿二千九百万美元，而在“公司利得税”项下增加的五十三亿美元，也是间接地增加人民的负担。“每做八小时工作，就有两小时是为捐税而工作！”在事实面前，美国资产阶级报刊也无法否认：所谓“赋税改革”，实际上只不过“意

味着企业在机器投资上的大量减税，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个人来说，则意味着更重的捐税负担”。

尽管肯尼迪挖空心思加重人民的捐税负担，但飞快加大的军费开支仍然给国家预算增添着日益膨胀的赤字。于是，增加国债就成了肯尼迪政府搜刮民财的另一个“法宝”。

在去年六月美国国会应肯尼迪的请求提高美国国债最高限额以后，《华尔街日报》曾经说道：“当肯尼迪先生要求奔向新边疆时，他到底指什么，对此我们无需再有怀疑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叫作二千九百三十一亿七千二百七十九万四千九百八十四元六角二分美元的新边疆。”其实，《华尔街日报》的这番话未免说得太早了一点，因为这个数字还只不过是肯尼迪走向“新边疆”的起点。新年一过，肯尼迪就把国债的数额迅速推进到二千九百七十九亿美元了。而且，紧接着，在他一月份向国会提出的“预算咨文”中，又借口不给财政部的工作“造成严重的困难”，进一步要求国会把国债的限额再增加一百亿美元，达到三千零八十亿美元（美国国会已在三月二日授权肯尼迪把国债的“临时性”限额提高到三千亿美元）。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国债最高限额三千亿美元还多八十亿美元。

联邦政府的巨额国债，从来是美国人民的一大祸害。因此，美国人民多年来一直要求摆脱这项沉重的负担。虽然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的历届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曾在口头上扬言要减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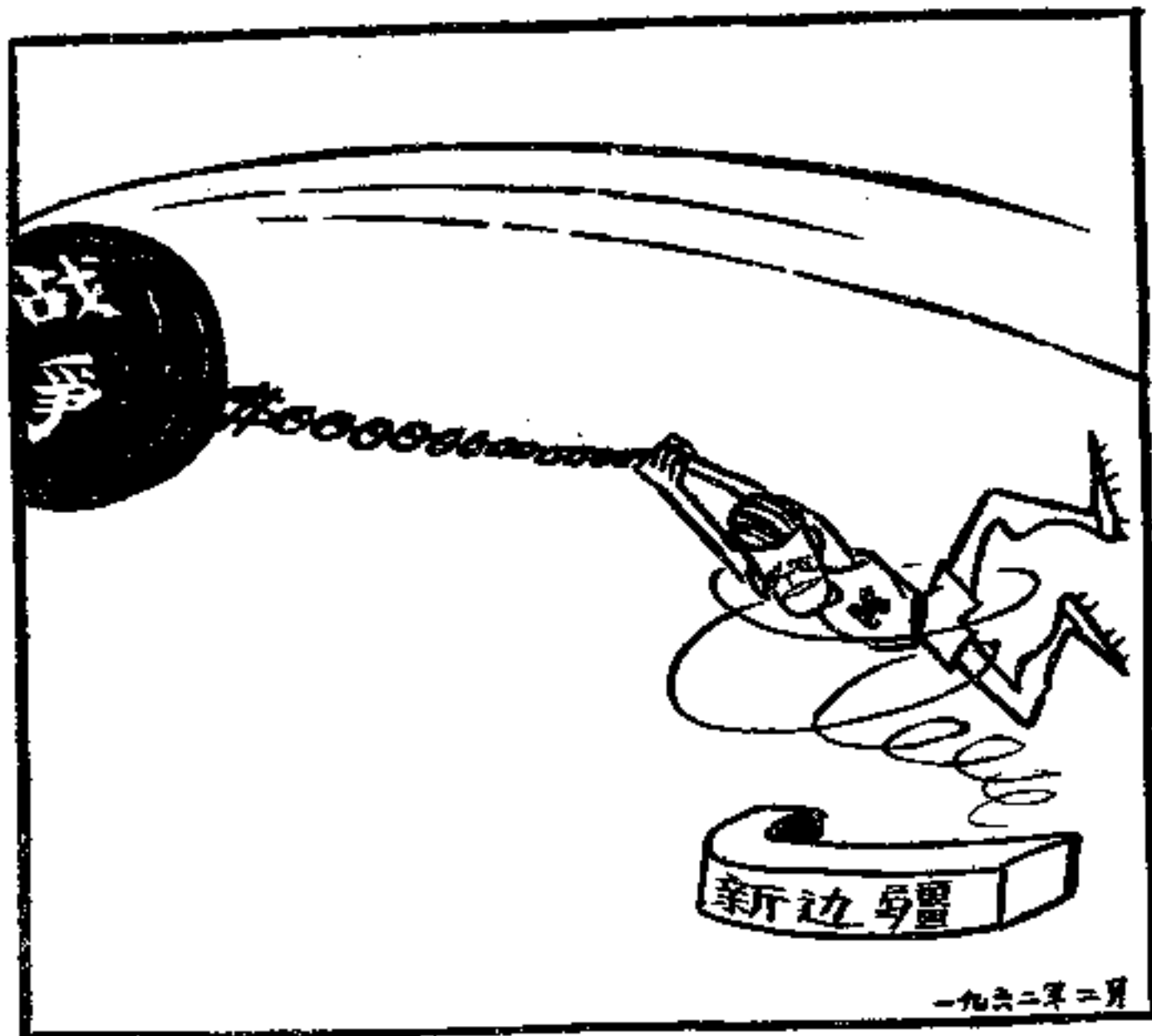


債，但是美国政府預算連年出現的赤字，却使这些諾言一个一个都成了画餅。肯尼迪上台以后，索性连这个餅也不画了，为了加紧搜刮扩軍备战的費用，他一次比一次更急迫地把國債限額提高到新的頂峰。

肯尼迪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假仁假义地表示对“今天最年幼的孩子”的“关怀”，并且言不由衷地許願說：“我們的計劃是要……使所有的人得到美国生活的充分好处”，而且还“要把我們的国家产业遺留給子孙后世”。可是，事实却

是：他提供給美国人民和留給后世子孙的并不是什么“美国生活的充分好处”和什么“国家产业”，而是日益加重的捐稅負担和还也还不清的債務！

这一点，就連英国《卫报》也評論說，美国統治集团这种只“願意在防御上花大笔公共經費，但是特別不願意花在福利計劃上”的政策，已經成为美国“經濟图景中最大的污点”。可是，肯尼迪在他提出的“国情咨文”中，还虛伪地裝出一副乐善好施的面孔，說什么“为了帮助所有的（美国）人中最不幸的人，我将建議一項新的公共福利計劃”。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計劃”呢？肯尼迪回答說：這項計劃“不強調補助”，“不強調救濟”。肯尼迪既要侈談“福利”，却又不願在福利上花錢。在一九六二財政年度中，列在



飞向更新的边疆

华震威

“卫生、劳工和福利”項下的开支，仅不过占全部預算开支的百分之五点二。就是这样，肯尼迪仍嫌太多，表示还要减少失业救济的支出。据美国官方統計，目前領取政府食品救济的家庭，如果按四口之家計算，平均每人每天还摊不上八分錢。

很显然，肯尼迪的这个“大胆而富有想像力”的联邦政府預算，并不是为了建立什么“全民福利国家”，他所說的“国家福利的許多考虑的綜合”，絕不是什么人民的“福利”的綜合，它只不过是从工人階級和广大人民那里拿走亿万美元重新分配給壟断資本的一种巧取豪夺的工具而已。劫貧济富，拼命为壟断資本搜刮財富，这才是肯尼迪的真正的“目的”；而“全民福利”云云，只不过是他掠夺人民財富的幌子罢了。



关于臭椿—蓖麻—蓖麻蚕—寄生蜂的 連串发展和綜合利用問題的芻議

朱 洗

一 为什么要飼养蓖麻蚕？怎样推广蓖麻蚕？



1. 需要开辟更多的增产蚕絲的途徑

我国是家蚕（桑蚕）的祖国，几千年来，以飼养这种吐絲的昆虫著名于世，并首先发明繅絲織綢的技术。根据一般想法，要想多增产蚕絲，以滿足人民的需要，只要多种一些桑树，多养一些家蚕，問題就解决了。多种桑树，多养家蚕，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也应该看看世界上能够吐絲的昆虫种类，究竟有若干？可以利用、又适合我們利用的，又有若干？如能广予調查，多利用几种吐絲的昆虫来为我們增产更多的絲料，发展蚕絲的前途岂不是更广阔么？世界上已知的，有三百多种吐絲較多的昆虫。我国过去常利用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早已馴化成家养的、吃桑叶的桑蚕；另一种是尚屬野生放养状态的、吃柞树叶的柞蚕。另外虽然还有几种野蚕（如吃樟树叶的樟蚕，吃臭椿叶的椿蚕等），偶然有人利用，但为数甚少。这些野蚕如果經過改良、培育，也可以使它們

发挥更大的生产能力。这是蚕絲界应该注意的工作。此外，如日本的天蚕和印度的蓖麻蚕，在这些国家里，也有久經利用的历史，各有优点可取。我們应该引种馴化，使其适合我国的环境条件，加以飼养。如能增添一种新的吐絲昆虫，就好比添了一批新兴的产絲生力軍。目前虽能制造各种人造纖維，可是，用人造絲代替天然絲，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們要积极发展制造人造纖維的工业，同时应当大力发展养蚕业。养蚕比較費人力，但这对于我們人口众多，农村里有广大輔助劳动力可以利用的国家来说，也正是发挥劳动潜力的大好机会。况且我国农村的妇女早有养蚕的习惯。为了增产更多的蚕絲，除了发展久有飼养习惯的桑蚕和柞蚕以外，发展蓖麻蚕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徑。

2. 蓖麻蚕的优点

蓖麻蚕体质强健，发育快，飼育期較短（十八天左右），而且不怕炎热，不怕雨湿；



在 16—32°C 气温的条件下都能养育。华南一年可养八至十次；华中、华北，自七月到十月底，可养五至六次；东北可养二至三次。蓖麻蚕在印度原属半野生的。顾名思义，是以吃蓖麻叶为生的。但究其实际，这蚕的食性较杂，能吃多种代替品，如北方的臭椿叶和南方的木薯叶都能吃。再拿蓖麻来说，它在暖季陆续发芽抽叶，所以生长特别快，叶量较多。从我们在上海地区的试验结果来看，种植一亩蓖麻，每年适当定时疏叶（约占总叶量的三分之一），无妨结子，可饲养二万多头蚕；收茧量与一亩桑树养的桑蚕茧量不相上下。若能同培桑一样，精细培植蓖麻，其产叶量还能大大增加，收子量也能增加。加以蓖麻通常是一年生的植物，当年春间播种，夏秋即可养蚕，无需长期栽培。所以饲养蓖麻蚕不但收茧快，次数多，而且所费劳动力也比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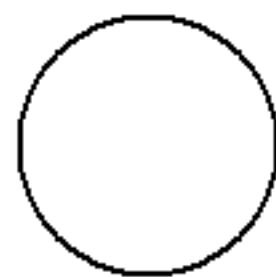
蓖麻蚕的食叶量与桑蚕相似（全生吃八钱到一两），茧的重量也不相上下（每茧三克左右）。蓖麻蚕的茧丝层很疏乱，茧的一端有一小孔，不利缂丝。这是它的缺点。但现已试验缂成“疙瘩丝”，并织成别致的疙瘩绸。上海绢纺厂已将蓖麻蚕丝纺成二百至三百支细绢纱，织成各种有花或无花的丝织品。蓖麻蚕丝的外形与物理、化学的性质，也有与家蚕丝不同之处：“强力”比不上家蚕丝，可是“弹性”却比家蚕丝强一倍。至于上色性、耐热力和吸湿性都很好。它的丝条是扁曲的（家蚕丝是圆柱形的），容易与羊毛混纺，成为丝毛织品，如呢绒等。

3. 全国解放后培育和推广蓖麻蚕的经过和初步经验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同志，就由国外引入原产印度的、吃蓖麻叶的蓖麻蚕来上海试养。过去这种蚕在我国试养过多次，都先后失败。前人失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1. 这蚕的卵和蛹都不冬眠，冬季无叶饲养，势必绝种。2. 在大陆气候之下蚕卵屡屡孵化不良，蛹也常常不能羽化成蛾传种接代。这些都成为饲养保种的难关。我们经过几年的研究，也遇到几次濒于绝种的危险，但终于一一攻破这些难关，于一九五四年试养成功。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开始在若干省的蚕丝单位中试养或小规模推广。

蓖麻蚕这一名字，一般人是生疏的；而在农村中传授养蚕技术，又是一件较复杂的事情。所以推广起来不是很容易，难免碰到一些困难。好在中国科学院和农业部一直鼓励我们做这种研究和推广的工作。一九五四年以后，我们开始陆续接收各省选派来实验生物研究所学习饲养蓖麻蚕的少数人员。以后，我们又办了几次训练班，以推广这一新兴事业。虽然在推广初期遇到一些困难，但也有若干据点，初次试养就获得成功的。如安徽阜阳专区、镇江蚕丝研究所、西北农学院、安徽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等，经过试养，都认为这种蚕可以在国内发展。

经过最近几年的推广试验，确实证明蓖



麻蚕为农民所喜爱；它在农村生根落户，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有关部门加强领导，注意研究和解决推广中的困难和问题，便能够使饲养蓖麻蚕这一新兴事业逐渐得到发展。从已有经验来看，推广蓖麻蚕应注意如下五方面：1. 先培养有技术的骨干，选择适当的地点，作实物示范性的宣传，并选择一些过去已经具有饲养基础的地区，作为生长点。在试点时，又用带徒弟的方法，边教、边学、边做。如有失败，必须查明原因，成功以后，再考虑向前发展，不宜操之过急。每一个生长点，每年推广的蚕种数量的增加速度，要看实际情况，作适当安排，并应有技术辅导人员，在蚕忙时巡回指导，总结经验教训。要渐次累积经验，增加熟练技工的人数。2. 待点的饲养成功，脚跟站稳，再由点到线、到面，逐步发展。至于发展速度，当然不能预先硬性规定，要以当时当地实际情况为转移。有些地区，可以发展得多一些，快一些；有些地区，可以发展得少一些，慢一些。3. 县或专区应有一个指导的中心，人数不要多，但要有熟练的技术人员，并且使他们在有时间从事进修，提高技术水平，逐渐使他们既能担负推广工作又能够钻研问题。4. 这蚕初到一个新地区，倘使初养即获成功，大家一定要争着多养。在这时候，要有一个节制；不然，技术尚属生疏的人，养的蚕数过多，容易失败，造成不良的后果。5. 在幼虫饲养、蛹期保护、制种、产卵、蚕蛾检查等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科学的技术措施，遵守操作规程，特别要注意蚕种质量，防止蚕病。总

之，这蚕虽然比较容易饲养，但也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所以发展要有一定的步骤。

4. 今后推广蓖麻蚕的展望

蚕是叶饲的。养蚕首先要有足够的叶量。要想推广蓖麻蚕，必须了解全国各地野生的和播种的蓖麻面积及其产叶的大概数量。蓖麻在我国各省都能生长。据极不完全的统计，东北、内蒙及黄河、淮河流域，原有很多野生的和半野生的蓖麻，所占地面，不在三百万亩以下，特别以内蒙和西北各省为最多。对于蓖麻能够种植的数量问题，我们曾于一九五五年秋季在安徽亳县做了初步的调查。这个县的十一条大小不等的河流两岸和许多道路、公路两旁，或多或少都有野生的蓖麻。根据地图缩尺推算，至少可种六千万株蓖麻。再加坟场、隙地，以及村外围水道两旁隙地，至少可以播种九千万株。这是一个估计。在不影响结子的条件下，每株分期适当疏叶，可以养二十头蚕。暂仅以半数作为基数（每株养十头）计算，则总共能养九万盒蚕种（每盒重二十克，蚕数约一万头）。另据涡阳县的估计，那里能种蓖麻的空地比亳县还多。

至于收益方面，仍以九万盒种估计，假定每盒种收三十斤鲜茧（最多每盒有收六十多斤的），则共可得鲜茧二百七十万斤。茧层量以百分之十二计，可得纯丝料三十二万四千斤，蚕蛹二百三十七万六千斤。蚕蛹富含蛋白质（鲜蛹含百分之十六，干蛹含百分之六十）和脂肪（鲜蛹含百分之六，干蛹含百



分之二十五)，等于无骨的“肥肉”。此外，还有大量的蚕沙（蚕粪及剩叶等）。每养五盒蚕种，所得的蚕沙，便可作一亩小麦的肥料。养九万盒蚕种所得的蚕沙，就可作一万八千亩田的肥料。这是間接的收益。

就全国来說，关于蓖麻的生长情况尚缺少必要的調查資料。但据中国科学院几位做过区系調查的同志說：整个西北和东北黄土、黑土和盐碱土地地区，都适合蓖麻的生长；几乎到处都有野生的叶子可以利用。黄河流域，根据蓖麻自然生长的情况，发展蓖麻蚕也有

現成的叶料基础。在这些地区，可能发展的前途，决不逊于皖北。有些紅壤地区，土质过于結实，酸度过高，在这种地区，蓖麻也能生长，但没有在华北砂土地地区那样容易繁茂。

注意保护野生的蓖麻，再在荒地和零星空地上多多播种蓖麻，所得的收益是多方面的，上面所說的疏叶养蚕，仅是其中之一而已。通过推广蓖麻蚕，还可以使臭椿——蓖麻——蓖麻蚕——寄生蜂，得到連串的发展和綜合利用。



二 为什么要連串发展和綜合利用？

我們根据对臭椿、蓖麻、蓖麻蚕和寄生蜂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认为它們的連串发展和綜合利用，对于生产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意义的。

1. 臭椿的經濟价值及其与发展蓖麻蚕的关系

臭椿是一种具有羽状复叶的高大树木，我国各地都适宜生长。在我国最古的一部博物书《尔雅》中，名为“樗”（所以这树上的蚕有名樗蚕）。这树生长得特別快，二至三年即可成林。根部入土很深，不怕風災与干旱。枝干富有彈性，能屈而复伸，不易被折。砍伐之后，即能由老株上再生許多新株。树皮很韧，木质洁白；但质地并不坚硬，不是建造的良好

材。虽有这种缺点，但我国森林学家仍认为它是綠化黄土地区的上选。根据新近研究的結果，知道这树中的纖維比較細长，可以作人造纖維的原料，它的經濟价值就更提高了。

臭椿树上，常常寄生一种背上有肉疣的青黄色的毛虫。这虫会結出一种树皮色的茧子，悬挂在叶柄或細枝上，人目易見；蛹在茧中化出两翅有眼斑的美丽蝴蝶。这是人們常見的一种結茧昆虫。河南、山东的农民常利用这种茧絲紡成土綢，名曰“樗綢”，充为衣着。我們問过山东乡村的老人，都說这种土法古已有之。始自何代，尚不得而知，留待考证。

五、六年前，当我们解决了蓖麻蚕本身的飼育問題之后，苦于沒有使它休眠越冬的良法。后来利用这种在我国土生土长的、自



己能够以蛹休眠过冬的臭椿蚕与自己不能休眠的蓖麻蚕杂交，再经过几年的培育与选择，便得到茧色纯白而能以蛹越冬的杂交种，冬季保种的困难也就减少了。

不但我们培育的杂交种蚕欢喜吃臭椿叶，就是纯种的蓖麻蚕也能吃新生的臭椿叶，结出茧子来。在西北和华北地区，每年若要大量发展蓖麻蚕，便非提早饲养不可。因为只有提早饲养，才能够增加饲养次数，增加总的收茧量。要想提早饲养，不能专依靠蓖麻叶做饲料，因为蓖麻是热带性植物，在温带地区，种子发芽较迟，必在清明以后，种子才发芽生叶，待到六、七月以后，才可以取叶利用。至于臭椿，发芽较早，五月即可利用养蚕。这样，臭椿多了以后，在华北各省，每年就可以提早养蚕，多养一代。这对制种繁殖的关系很大：蚕种数量可以因此增加百倍左右。这是臭椿——蓖麻——蓖麻蚕应该连串发展和综合利用的一种很明显的理由。

2. 种植蓖麻的经济价值

蓖麻属于无瓣花类中的大戟科，蓖麻属，花分两性，雌、雄花上下分生。欧洲有些人通常以为，这种植物原产非洲热地，后来渐渐传播全球。另有人说，它的祖居地区究在何处，尚未查清，因为在亚、美两洲，早有蓖麻。我国最早的字典书《玉篇》中，已有“蓖麻”之名。《本草》中说：“叶似大麻，子如‘牛蝎’，壳中白，肉如‘纈随子’，油可作印色，

子无刺者良，有刺者毒。”目前一般种植的蓖麻，它的拉丁文名：*Ricinus communis*，意即“狗蝎虫”，而我国的“蓖”字，据说是由“牛蝎虫”的形状推演出来的，因为蓖麻子和这种寄生虫的身材和色相太近似了。

蓖麻很明显地分成许多变种或品种。植物体高大的，叫“大蓖麻”，叶如伞盖；身材小的，名“小蓖麻”；茎紫色的，名“紫蓖麻”；茎红的，名“红蓖麻”；茎青的，名“青蓖麻”；蒴果外面有刺的，名“刺果蓖麻”；等等。蓖麻的产叶量、收子量和种子含油量的多寡，不但与种植地区的气候和土质有关，与品种也有关系。要想大量种植，便不能不考虑到选择适当的品种。

在亚、美、非三洲热地，蓖麻原是野生的植物，树大成林，高达十至十五公尺。在我国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海南岛各地，也成为多年生的木本树。但在有霜冻的各省，临冬枯死，即成草本植物。虽属草本，某地一經长了蓖麻，因其种子容易自己散落地上，明年会自己萌发成新株。所以蓖麻易种，不易除。对我们说，这也算是难得的优点。

蓖麻满身都是宝。第一，叶子可以饲养。第二，种子含油量多（达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蓖麻油是工业上宝贵的油料。因其粘度高（比重为零点九六），酸度低，不易氧化，不易凝結，故可作为上等滑油；染織厂里不可缺少的土耳其红油，也以此油为主要原料。据上海油脂部门的同志所做的试验，蓖麻油脱水后，可以替代桐油或部分替代亚麻仁油



使用，并可制造各种絕緣漆。蓖麻油还有一种特性，就是含有大量的蓖麻脂肪酸。这种酸类的分子結構特別，所以它的用途也特別廣闊。近年又发现这种油是高級尼龙絲的上好原料，更为工业界所重視。至于較細小的用途如印泥油，潤腸油，替代一般潤滑油等，就更多了。榨油后的油餅可作农作物的基肥。每亩野生的蓖麻，如能謹慎收子，每年不难得到三十至五十斤蓖麻子。如能稍事管理，不难达到一百斤左右，可榨油四十斤左右，油餅也有四十斤左右。第三，据上海煉麻厂等有关部門的試驗，蓖麻的皮层可作制造麻袋的原料；如能經過提煉，可作打字紙的原料。麻秆洁白，据上海江南造紙厂試驗，其中纖維也能用于造紙。第四，种蓖麻，对于綠化大地，調剂气候，巩固堤防，隔离虫害与鼠害，也能起一些作用。蓖麻的优点之一是家畜不喜吃它的叶子，鳥类不伤它的种子。所以西北农民都知道，地边种些蓖麻，不但可以收子取油，而且还是地上和地下两用的好藩籬。这正是我們需要的优良特性。

3. 利用寄生蜂消灭虫害；利用蓖麻蚕卵作赤眼寄生蜂的培养基

最后，說到寄生蜂。害虫对农作物的危害，众所周知。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灭虫的方法增多了，杀虫的药剂也逐年增多了。但是，消灭虫害，并不是只有使用化学药剂这一条路，我們还可以找到另外一种方

便、有效的方法。

我們知道，自然界中的生物原有互相控制的力量。凭借这种自然力，才能在它們中間建立某种比較穩定的均衡状态：使多的不能过多，少的不致絕种。在种类极其繁多的昆虫界里，相互約束发展的事实，到处可見。有的昆虫是食植物的，有的是食肉的，有的是半寄生的，有的是完全寄生于別种动物或昆虫上謀生的。食肉分子要杀害食植物的分子，例如食肉的瓢虫就欢喜生吞菜上和果树叶上万恶的蚜虫；它們的杀虫效果，不是一般药剂所能比拟。还有一些細腰的寄生蜂能預先为其后代安排寄生的好环境：活活捉住适当的俘虏（多半是害虫，如青虫、蟋蟀、蝗蝻等），用其尾部的毒針，給俘虏注入定量的有麻醉性的毒汁，令其麻醉而不致死，然后送入自己特制的泥窠中，待积起一定的数量，然后产卵于其上，封窠而去，不复返顾。它們的幼虫由卵中孵出之后，即安全地就近取用这些被麻醉的活物充饥，达到傳种接代的目的。

目前就已經知道的，有千百种的寄生蜂，专门寻找別种昆虫作为子代的寄主，借以傳种接代。有的欢喜使自己的后代寄生在別种昆虫的幼虫上，有的专门选择別种昆虫的卵，作为子代寄居的場所。对我們說，具有后一类习性的小蜂是最合理想的。懂得这种自然規律之后，近代的应用昆虫学家們便集中力量，研究那些微小寄生蜂，并找出它們寄生的对象。对象如果是农作物的害虫，那就可以利用它們杀灭害虫，减少损失。一



經找到好的杀灭害虫的寄生蜂之后，再想办法預先大量培养出它們的子孙，在适当的时期——即害虫产卵的时期——大量釋放出去，使其在害虫的卵上产卵，就可以杀死害虫的卵，达到保护农作物的目的。这应该說是近代“以生物制生物”的一种最巧妙、最有效、最經濟的方法。可是到目前为止，这类寄生蜂，一般仍难以在人工控制之下大量繁殖；只有一种赤眼寄生蜂，在这方面比較容易。

赤眼寄生蜂(*Trichogramma evanescens*)因有大大通紅的眼睛而得名。身体极微小，几乎像飞尘一般。在光綫稍暗的場所，可以說見不到它們的影迹。因为身体小，所以能够多养、多放。它能消灭多种鳞翅类的卵(如冬夜蛾、棉鈴虫、螟虫等)。全国解放以后，为了消灭螟虫的危害，許多昆虫学家就注意研究利用这种寄生蜂。广东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蒲螫龙同志，已用这种寄生蜂消灭甘蔗螟虫，收到显著的效果。对其他害虫，各方面正在研究中。据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同志說，在湖南各地，已經证明这种小蜂对水稻螟虫也有控制的力量。

可是，要大量培养这种寄生蜂，沒有适合的培养基是不行的。那末，用哪些昆虫的卵作为培养基，才能在最經濟、最方便的条件之下，預先大量培养出赤眼寄生蜂，以便临时使用呢？这是我們要討論的关键問題之一。

各国都有作为培养基的对象。有的是用夜毒蛾或柳毒蛾的卵，作为赤眼蜂的培养基。这些夜蛾不便人工培养；每枚蛾卵中，普通

只能培养几只寄生蜂，数目过多，便不能完成其发育。我国学者过去曾用寄生在松树上的松毛虫蛾的卵，作为培养基。这虫也不易人工培养；每卵能寄生的蜂数也不很多，很难达到大量培养的目的。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間，我們在广东初次推广蓖麻蚕时，蒲螫龙同志发现赤眼蜂最喜欢在这卵中产子，不但数目較多，而且雌蜂的比例也高。他并证明这是最理想、最方便的培养基。于是就把养蓖麻蚕和养寄生蜂这两件事情互相联系在一道了。

赤眼寄生蜂的产卵习性，非常有趣。当雌、雄蜂在蓖麻蚕卵內将出未出的时候，先在卵壳上咬开一个小小出孔，然后一一爬出，伸展翅膀，稍事休息，雌、雄即自交尾；分离不久，雌蜂立即寻找产卵的場所。倘在近旁有蓖麻蚕卵，它就用其尾后的产卵器，刺入蚕卵外壳，产卵于其中。不久即自死去。蓖麻蚕卵不論是新产的，已經受精发育的，或沒有受精、不能发育的，或甚至留在母蛾体中、沒有产出的腹卵，都为赤眼寄生蜂所欢迎。所以制种場里，一切殘卵同样能够利用作为培养基。赤眼寄生蜂的卵一經注入蚕卵之后，立即开始发育。这类寄居的胚胎和寄主的胚胎是势不两立的。几日之后，主胚被害，充作客胚的养料；最后，蚕卵壳內，滿藏这类发育很齐整的寄生蜂。它們很快就破壳問世，再事生殖。在实用方面，每一蚕卵能培养成功的蜂数，愈多愈好。据調查，每一蚕卵內，寄生数目自二十至七十；以五十左右比較多見。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大概每



隔十日，即能繁殖一代。这样，便不难計算这蜂的繁殖力了。假設每只母蜂每代(每十天)生五十个子蜂(雌、雄各为半数)，那末，下一代，就会有一千二百五十个子蜂；这样到了第十代，就有一百九十五万三千一百三十五亿之多！一年之中，倘使环境温度相宜，蚕卵不缺，則可連續繁殖二十至三十代。这种寄生蜂还有别的值得一提的优良特性：第一，只要有未达干燥的蓖麻蚕卵供它們寄生，无需再給任何食物，饲养的人不忙，不乱，而且它們对环境温度的要求，并不严格。第二，因为它們身材細小，在一升大的通气綿紙盒中，可以养許多万。培养所需的空間可以縮小，設備可以简单，几乎任何房子都可利用。但控制发育时，必須有各种指定的温度，必須有定温的設備。

利用生物防虫的科学研究工作，應該引起大家注意。将来这种研究工作如能和推广饲养蓖麻蚕密切結合起来进行，則对除灭虫害，增进农业生产，一定会起很普遍的作用。这一工作可大，可小，既可以在公社里进行，也可以設立專門的制蜂厂进行。

作了以上这些申述，方才将臭椿——蓖麻——蓖麻蚕——赤眼寄生蜂这四种不同的动、植物中間的相互关系說清楚。只要这些关系是确实存在的，不是牵强附会的，那末，由这里推演出来的“四位一体”的发展和綜

合利用的道理，就可作为考虑問題的綫索，也可以作为今后进行工作的目标。我极希望国内林业科学的专家、植物地理学家、油料作物的专家、纖維原料的专家、蚕絲事业的专家、生物治虫的专家們和对这类十分复杂的綜合利用問題有兴趣的各有关单位的同志們，关心这些問題，对我这一芻議思考一番，提出意見。

倘使不大搞，不作全面的計劃，只作小規模的試驗，这也是穩妥的办法。那就可以选择一个县，或某些国营农場和公社，作为試驗点。这样反觉灵活，輕而易举，用不了太多的資金，花不了太多的人力。第一年春季，在荒地、隙地、河边、路旁，多种臭椿和蓖麻；长大后分批疏叶，饲养蓖麻蚕，可以陸續有茧收成；待到秋末，可以收蓖麻子；冬初下了霜之后，即可剝麻皮，收麻秆。这都是当年收成的农业和工业很宝贵的物资。待到第二至三年，臭椿长大成林。因为这一植物发芽較早，五月間即能取叶养蚕。这样能提前先养一两批蚕，增加收益。而且这树的生发力很强盛，摘叶时如果不伤頂芽，对于树的生长影响不大。养了早蚕之后，天气正炎热，臭椿叶过老，蚕不爱吃；当时正值蓖麻生长旺盛，即能以蓖麻叶作为蚕的食料。臭椿长大后，木材可以利用。至于借蓖麻蚕卵培养赤眼寄生蜂等工作，可視各地具体情况适当进行。

